

記 憶

REMEMBRANCE

2008 年 9 月 18 日

第二期

2008 年 9 月 13 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风云人物

迟泽厚：一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同志晚年

丁 盛：与马、徐、王谈话的真情及我的自白

学术研究

宋光瑛：银幕中心的“他者”——革命样板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节选）

蓦然回首

李木森：令人震惊的“一〇·二七”事件

书评与序跋

徐友渔：是文化的革命还是武斗？——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序

徐海亮：从《深翻》看老外笔下的农村文革

简讯

余汝信：《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公开出版

唐少杰：《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简介

樵 余：重庆文革墓群近 30 年简况

故纸堆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戏剧口批判组：杂技艺术的新生面

小资料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程明远、刘秀山简介

编读往来

【风云人物】

一腔悲愤谁诉

——记丁盛同志晚年

迟 泽 厚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举国欢腾。然而，就在人们翘首期待着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恶、拨乱反正之时，却传来了与“四人帮”既无历史渊源、言行又格格不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成为“四人帮”的同党被“揪”出来的消息！丁盛在1974年之前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多年，这一消息在广州军区机关引起很大震动。我作为长期在广州军区机关秘书部门工作，对丁盛有所了解的人，更是深感惊诧，百思不得其解。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点名

丁盛被定为“四人帮”同党，是由因领导粉碎“四人帮”而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亲自点名的。1977年3月24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7万多件，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一个大军区司令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有些了解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人感到不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时间军队权力极大，华国锋是靠广州军区“力挺”才在湖南站住脚的。1970年，

47 军军长、湖南省革委会主任黎原因部队移防而调离湖南后，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卜占亚奉命去湖南“支左”，本可顺理成章接替黎原职务，但丁盛和军区政委刘兴元却力主由华国锋当一把手，卜占亚退居第二。丁盛是有恩于华国锋的。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大事常先征求刘兴元、丁盛的意见，对刘、丁毕恭毕敬，有如下级对待上级。为什么如今时隔几年，华国锋竟会对丁盛说出这样的狠话来呢？

有的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的华国锋已经是全党的“英明领袖”，抚今追昔，想想当年他仰广州军区领导之鼻息的那段经历，他心里大概会不是滋味的。不能期望他报什么恩，倒要谨防他找碴儿报复。历史上这种事情太多了。秦末最早起来造反的陈胜，曾对一起给地主干活儿的同伴说过“苟富贵，无相忘”这样仗义的话，可等他当了大王之后，穷哥们儿来投奔他，他却怕暴露自己的卑微出身，把来人杀了。江青狠整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旧交，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华国锋除了整丁盛之外，还整了广州军区一大批干部，绝不是偶然的。再说，华国锋要整丁盛，也是有由头的。1972 年，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决心把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要丁配合，丁却认为卜占亚即使有错误，也只是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便敷衍了事，让华很没面子。以后卜占亚屈打成招，丁盛却因毛泽东说了他的好话而逃过一劫。如今有了机会，岂可错过！

当然，要整丁盛的绝不止华国锋一人。起码，如果没有军内有力人士的点头、支持，华国锋不会有此胆气。

磨难

被华国锋点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撤职，抄家，无尽无休的拉往各处批斗，两次长达两年多的不说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手续的关押，妻子儿女被赶出军区大院……

1980 年之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不再英明，他说过的很多话，做的一些决定遭到批判。但是，奇怪的是，他对丁盛的定性，却被不走样地继承下来。

1980 年开始的“两案”审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所以没有出庭。11 月 12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丁盛的起诉书称：“1976 年 8 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

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就是 60 军’，‘这个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随后突击发枪 74220 支、炮 300 门、各种弹药 1000 多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准备。”

据说，起诉书的材料来自“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的供词。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荒唐、幼稚，丁盛怎么能讲出这样没水平的外行话来！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建制部队的调动大权集中于中央军委。对像丁盛这样的大军区领导而言，只要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都能调动；未经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也不能调动。因此，不存在哪个军调得动、哪个军调不动的问题。我尤其奇怪的是，起诉书为什么偏偏提到 60 军？要知道，60 军在南京军区所属的几个军中，在历史上并不是很强的部队。倘若起诉书认定丁盛真的讲了 60 军他调不动这样的话，这可算是对这个军的褒扬，那么，反过来岂不是说南京军区的另几个军，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硬骨头六连”所在的第 1 军，倒是可以放心，可以调动他们参加“四人帮”的叛乱吗？这岂不是在政治上对另几个军的莫大的侮辱吗？

这个起诉书的材料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其执笔者在其他方面还是颇有心计，颇下功夫，可算是一个老到的刀笔吏。如丁盛明明是到上海一带做战备勘察后住进延安饭店，马天水等人是偶然得到消息去做礼节性拜访的，但他却写成“……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笔尖轻轻一转，就变成丁盛是专门去上海与马天水等人密谋了。丁盛与马天水等人这次会面前后不过一个小时，当时丁盛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都可作证，起诉书则写成“作了半夜密谈”！好个“半夜密谈”，要多严重有多严重！

又过了 1 年零 8 个月。1982 年 7 月 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才对丁盛下达了一个《免于起诉决定书》。决定书完全肯定了 1980 年起诉书中所列的丁盛罪状，“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而且“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因为丁盛是“从犯”，于是“决定免于起诉”。

《免于起诉决定书》对丁盛“罪状”的表述与《起诉书》略有出入，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丁盛）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这两句话分量很重，对丁

盛投靠“四人帮”的决心表述得淋漓尽致，但是，却又引起我的一连串疑问。这里最大的疑问是：丁盛与马天水等人素昧平生，政治上丁盛对他们毫不摸底，特别是徐景贤和王秀珍，还是为丁盛所鄙视的“造反派”，他们又没有预先串连，丁盛凭什么对他们竟会一见倾心，冒冒失失，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筹码，毫无顾忌地同他们密谈“打内战”的问题呢？难道他不知道，从古到今，窃议最高领导人（古代是皇上）的身后事，都是要命的弥天大罪吗？

“免于起诉”自然是宽大处理，但就性质来讲，仍属刑事犯罪，行政和党纪处分那是免不了的。职务早在 1977 年就没有了，决定书下达之后，接着是命令“退出现役”（有人干脆称之为“开除军籍”），交地方安置，开除党籍。原有的物质待遇自然都没有了，每月只发生活费 150 元。

把丁盛交地方安置，也是有条件的：沪宁线不行，回广州不行，北京更不能去。争来吵去，直至 1984 年 7 月才把他交给了南昌市老干局的一个干休所，而且不得随带子女。

由于心情不好，生活、医疗条件又差，1984 年 9 月 18 日，丁盛在去医院看病途中，突然心脏病发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多年来遭受的无数屈辱郁积心头，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个打了半辈子仗、人称丁大胆的老兵，竟然如江河决口，失声痛哭！在场者无不凄然。他认为自己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背着黑锅死去，他还是相信组织，相信共产党，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派人来听听他的最后陈述。总算不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各来了一位处长。听了丁盛的陈述，两位处长也为之动容，却爱莫能助，只能答应回去后如实汇报。丁盛的病情日益严重，到了 10 月间，终于同意他回南京治疗。军队医院不能住，他被安排住进了铁路医院。

漫漫申诉路

丁盛是个性情刚烈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他也在风口浪尖经受了不小磨练，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人会把“参与政变阴谋”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他困惑，他委屈，他愤怒，他豁出去了。他从不认“罪”，他奋起抗争。他同每一个要他交代问题的人吵，对着干。以后感到这样做没有什么用处，就横眉冷对，不理不睬。

他写过许多申诉，但都是泥牛入海。

笔者也介入了丁盛的申诉活动。

我与丁盛其实并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49年8月，我所在的四野第48军解放赣西南地区后，军主力奉命就地驻防剿匪。这里是丁盛的家乡，当地一些群众向我提到他，我才知道有个丁盛。此时他是45军135师师长。1960年，丁盛率由44军和45军整编而成的54军主力在西藏平叛，恰巧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才第一次见到他，并有过短暂的交谈。1968年春他从新疆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一年多后任司令员，我先任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长，后任办公室副主任，才与丁盛有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我从1951年开始做秘书工作，1953年调中南军区司令部。几十年间，除当过几年作战参谋外，一直在秘书部门围着领导转。几十年的秘书工作经历使我得出一个结论：领导干部的活动，从工作到私生活，很难逃出一个尽职尽责的秘书或秘书部门的眼睛。以我对丁盛的了解，从一开始我就对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深感怀疑。及至看了他的“罪证材料”，更感到难以令人信服。

1988年8月，我回山东探亲，在烟台意外地与丁盛夫妇相遇。他们住在一个老战友的孩子家。我与丁盛进行了一次长谈。我问他：定案材料中讲，他曾于1976年8月8日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讲，60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激动地说：“根本就没这回事！60军是我到南京之后，为了战时加强长江口的防御，经我提议，报中央军委批准，才从江北调到沪宁线的。如果我指挥不动，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如果不是心存偏见，应该承认丁盛讲得确有道理。

定案材料又讲，“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听了丁盛关于他指挥不动60军的谈话之后，便给他们控制下的民兵突击下发了大量武器弹药，准备发动武装叛乱。材料的炮制者竟然没注意到，1976年12月1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早已认定“今年（1976）6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某些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可见此事早在所谓丁盛关于60军的谈话之前两个月，“四人帮”就已作了决定，现在却又扣到丁盛头上，露了大马脚。这种造假水平实在太

低，用一句山东话讲，是顾头不顾腚啊！

听了丁盛本人的陈述和研究了若干材料之后，我感到对他的定罪材料存在着很大的任意性，破绽百出；而且对丁盛这样处理，并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我有责任帮他把此事弄出个究竟。

1989 年冬，丁盛来广东，先到深圳他女儿克西家住了一段时间，春节后应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杨梅生的遗孀刘坚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之邀，又到广州住了一段时间。1990 年 2 月 27 日，在李维英处，丁盛夫妇、李维英夫妇、丁盛的老秘书陈宏康和我，一起研究了丁盛的申诉问题。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解不解决问题在你，但不可中断、放弃申诉，即使申诉无用，“立此存照”也好。随后，由我执笔写了一份《我的申诉》，针对《免于起诉决定书》所列罪状，逐条进行了辩驳。

这年 5 月，丁盛夫妇去了北京。丁盛先是找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后又找中纪委、军委总政治部。几个部门似乎都有权力、有责任管，又都有理由不管，跑了几个月，没有一点结果。最后他不得不去找他的老上级、十大元帅中唯一在世的聂荣臻元帅。这年聂荣臻已是 91 岁的老人。聂荣臻元帅办公室负责人周均伦很同情丁盛的遭遇，亲到丁的住处看望，建议丁盛给这位老帅写个报告。随后，周均伦拿着丁盛的报告向聂荣臻汇报了丁盛的问题。聂荣臻对丁盛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和解放后的工作成绩都给予很高评价，但对丁盛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情况，则因他在 1967 年后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基本没有工作而知之甚少。他采取了客观、负责的态度，交代周均伦以他的名义把丁盛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的一位副主席和军委秘书长，请他们认真受理丁盛的申诉，弄清情况，按照党的政策作出适当处理。丁盛得到消息，不胜欢喜，但他苦苦等了一个多月，却再无下文。以后他了解到，军委这两位领导人根本没把聂荣臻的批示当一回事，其中一位还口出不逊，说是“多管闲事”！倘若聂荣臻当时还在台上，事情肯定不会是这样了。

这件事让丁盛受到很大刺激。元帅批了都不管用，在北京住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北京的天气也冷起来了。他应在天津的一些老部下的邀请，又到天津住了几天，到民权门和金汤桥一带默默凭吊了当年攻打天津时牺牲的烈士，便又两手空空，悄然返回深圳的女儿家。

不愿解铃的系铃人

沉寂了几年，丁盛决定继续申诉。笔者同他一起分析了形势：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其复杂处就在于他被扯入了一个集团案，整个集团定性未变，他的问题很难单独解决。因此，要有长期思想准备。但是，如何申诉，还是大有文章可做。我注意到，丁盛的定案材料只有一条罪状，即由于他讲了 60 军不听指挥的话，结果导致“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准备叛乱。而此事据说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受审查时交代的。我想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案：如果能让三人中的一人讲出他们当时是如何编造出这个口供的，岂不就可以从根本上推翻对丁盛的指控了吗？由于马天水已经死亡，而王秀珍是个工人，我建议从徐景贤身上突破。丁盛赞同我的意见。

1998 年 4 月 14 日，我先给上海一位作家写去一信。这位作家以写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事件内幕和风云人物秘闻而蜚声文坛，他与徐景贤是老关系，我与他有一面之交。由于不知道徐景贤的通信地址，给徐的信需请他转交，同时也希望他和徐先通一通气，做做徐的思想工作。信发出后不到一周，我又托去上海出差的一位熟人去拜访这位作家，着重就如何给徐景贤写信问题向他求教。这位作家表示愿意帮忙，并就该如何给徐写信提了很好的建议。

5 月，丁盛按照作家的提示给徐写去一信，请作家转交。徐景贤等人的“证词”让丁盛毁掉了一生荣誉，饱受磨难，但丁盛在信中却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大度。他先是对徐热情问候，然后讲了他的现况，最后才恳切地提出希望徐景贤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明关于丁盛的那段口供或曰“证词”的来历。信中写道：“如前所述，给我定罪的由头是 1976 年 8 月 8 日我同你们三位的会面与交谈，而惟一的证据则是所谓你们三人的‘证词’。同样，这‘证词’又成为拒不受理我申诉的挡箭牌。我深知你们当时的处境，倘若真有什么‘证词’，也不难想见它是怎样产生的，其责任并不在你们。实际上对我的处理早已内定，有没有你们的‘证词’，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丁盛在同时写给那位作家的信中，除对作家的热心表示感谢外，并提出如认为他给徐的信有何不妥，可以指出，退回重写。

然而，信发出后，徐景贤却未回应。

2000 年春，我去大连看望我的入党介绍人，曾目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程搏九同志。归途我特意在上海停留。5 月 20 日上午，我去拜访那位作家，专谈

丁盛问题。他说，收到丁盛写给徐景贤的信后，便经由徐的小女儿将信转交给徐了。作家说：“丁司令（他确实是这样称呼的）的信写得很明白，徐景贤看后也会认真考虑的。”但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是不会为丁司令员作证的。他知道，如果现在由他出面来推翻他原来的供词，那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果是由组织出面，比如中央组织部收到丁司令员的申诉后向他作调查，那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会一五一十地把问题讲清楚。”

“这个人很聪明，可惜太聪明了！”“听说他现在正在写回忆录，不知道他会不会提到这件事。”“他虽然已经恢复了公民权，但是仍由市××局×处管着。”最后，这位作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丁司令员的问题，只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胡耀邦。可惜他死了！”

我认为这位作家对我这个新交的谈话是坦诚的。我提出，想争取和徐景贤直接谈谈。他把徐景贤女儿的电话告诉了我。我随即给徐女士打电话，说 1969 年开“九大”时我曾同她父亲打过交道，也可算是旧交，我定于 22 日离开上海，希望走前能看看她的父亲。第二天，徐女士来电话告诉我：他父亲和几个朋友到郊区去了，可能当天不能回来！

事情果如那位作家所料。既然他有顾虑，不肯见我，岂能勉强？罢了！

2004 年，徐景贤在香港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他自称此书是“忠实于事实，对历史负责”，却对他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下干的坏事极尽洗刷、粉饰之能事，并多有讹误。如书中讲：“九大”期间，上海代表团仅于三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在住地京西宾馆对陈毅元帅批斗了两次，即听从周恩来的劝告“适可而止”。这是公然撒谎，实则对陈毅的批斗几乎贯穿“九大”的始终。他把时间、地点也弄错了：“九大”是四月一日才开幕的；上海代表团也不住京西宾馆，而是与我所在的广东代表团同住北京饭店。对丁盛问题，他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中承认曾与丁盛有过“密谈”。而奇怪的是，在正文中却根本未提此事。这么一件关乎他和丁盛命运的大事，岂能疏忽遗漏？正如那位作家所说，这人“可惜太聪明了”！

总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时断时续的申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结果。在物质待遇方面还是多少有

些收获。

1993年8月2日，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向南京军区发出通知，将丁盛的生活补助费每月增加50元；可以享受与当地退休干部相同的生活补贴和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同的价格补贴；医疗由军队按正师职干部安排。

1995年，经中纪委和军委纪委协商，决定将丁盛收回军队，由广州军区接收安置。广州军区为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排了一套师职离休干部住房。从此，丁盛夫妇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漂泊生涯，总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在生活上一向比较随便，随遇而安。自从遭整之后，在政治上他不服，他愤怒，他抗争，但是在生活上，他却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过去他是不管家的，也不需要他管。现在，凡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什么都干。1984年10月之后，丁盛因病从南昌回南京治疗，以后几年大部分时间便与妻子儿女们住在一条小巷内的一栋旧民宅里。当地居民经常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提着篮子出入菜市，买些便宜菜。不久，大家便知道这是原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是个老红军、老将军。有的邻居和他攀谈，感到这个老头儿很和善，很随和，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有人叫他“丁司令”，他赶紧摆摆手说：“咳！别这么叫，我现在不是了，叫老丁。”

丁盛治军很严，但平时关心爱护干部，尤其关心下级疾苦，这方面口碑很好。他遭整后，54军和原45军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几乎没人相信老军长会干起诉书所指控的那种事情。过去一些与他没有联系的老部下，在他遭难之后，反而通过多种渠道与他联系，有些人还邀请丁盛到他们所在城市走走看看。54军和原45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东北打到两广，不久后参加朝鲜战争，回国后改隶成都军区，参加了西藏平叛和中印边境作战，以后又先后转隶武汉、济南军区，因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54军的转业干部和离退休干部。丁盛应老战友和老部下之邀，与妻子一起到过不少地方。每到一地，探访者应接不暇。在北京和天津、昆明、重庆等地，因为要来看望的人和丁盛要回访的人太多，便有热心人组织聚餐会，北京的聚餐会竟然到了近200人。有的人与丁盛分别几十年，见到当年英姿焕发干练豪放的老首长，如今历经磨难，竟像是换了另一个人，无不为之黯然。丁盛夫妇要走了，大家争着为他筹措路费。有些早年转业的基层干部，生活相当困难，也一定要凑几块钱，表达一点心意。丁盛曾多次对熟人讲，他晚年有三靠：

一靠妻子儿女，二靠组织，三靠老战友。前两靠不言而喻，第三靠丁盛感受最深。这些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在他遭难之后，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而且在政治上继续信任他，大家不相信他会参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老战友、老部下对自己的关心和信赖，使丁盛得到极大宽慰，更激励了他为讨还政治清白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一讲起同这些老战友的深厚情谊，丁盛就满怀深情，激动不已。

丁盛的第一靠是靠妻子儿女。在精神和生活方面，他确实一直得到妻子儿女的极大关爱，但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指靠不上的。丁盛被点名批斗之后，还没等到正式处理，他的妻子儿女便都受池鱼之殃，几个孩子或转业，或下放，全家在经济上顿时陷入困境。上世纪 80 年代丁盛那 150 元的生活费，他要用于安排全家生活。他要尽量省钱。1993 年 8 月，他和妻子乘火车从济南回南京，嫌软卧太贵，买了两张硬卧。是老式的三层硬卧车厢，售票处按惯例卖给他们一上一下。丁盛让妻子睡在下铺，他费尽气力，战战兢兢地爬上爬下。到南京后，又是连日酷暑难耐，这年他整 80 岁，哪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结果大病一场，差点儿送了性命。这种日子，对一个过去的大军区领导人来说，心中会是什么滋味？

1995 年 4 月，我受命为一位开国上将作传，去深圳采访住在女儿家中的丁盛。此时丁盛的几个孩子通过自身努力，都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全家经济状况明显改善。采访完了我要离去时，丁盛起身从窗台上拿来一个装有许多硬币的罐头盒子，对我说：“你坐公交车，车上不找零，你拿点零钱去。”他夫人在一旁说：“深圳上车 7 毛钱，实在别扭，还不如干脆像广州那样，收 1 块钱算了。”丁盛听了一本正经地说：“我就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就不嫌麻烦，还是愿意省这 3 毛钱。”他的话让我感慨万千。有句俗语：“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有过过苦日子的人，是不会有丁盛这种感受，说出这样话来的。

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家之后，物质生活有明显改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这里毕竟可算是他的“老家”——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再往前追溯，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 115 师，红军时期是中央红军。丁盛一参加革命就在中央红军。说是宗派、山头情绪也罢，怀旧也罢，军人对老部队都怀有特殊感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到一个没有一点历史渊源的新环境和在老部队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是这个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大部分是丁盛任军区司令员时的司令部

机关干部，丁盛对其中许多人都很熟悉，彼此可谈的话自然很多，也不必互相戒备。丁盛喜欢下象棋，情报部的一位副部长是和他经常交手的棋友，两人有时一下就是半天，杀得难分难解，旁边还经常围着一圈为两边支招的人。干休所领导自然也了解丁盛的情况，对他尽可能给予一些照顾。

1999年初，干休所建成一栋30层新楼。新楼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丁盛住的房子要好。干休所又把他安排到新楼。丁盛对新房十分满意，他最喜欢的是主房的南面有个大阳台，夏天可以乘凉，冬天能晒太阳。他在阳台上摆了一个茶几和一对沙发，经常和夫人在此小憩。他曾对我说，他住过很多房子，但他最喜欢的是两套，一套是他当军长时在重庆住的，再就是这一套。这套房子设计合理、适用。

最后的关怀 最后的遗憾

1998年8月，为讨还政治清白而坚持斗争、苦苦等候的丁盛，忽然得到北京一位老友传来的喜讯：丁盛的老首长、“两案”审判时担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的黄火青，决定亲自出面请求为丁盛平反，要丁盛立即赴京，面商有关事宜。丁盛兴奋不已，立即和妻子赶往北京。

抗日战争末期，丁盛曾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当时黄火青是党校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黄火青曾兼任热河军区政委，丁盛是热河军区下属一个军分区司令员；稍后，黄又任冀察热辽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丁盛是这个军区的一个旅长。新中国成立后，黄火青专做地方工作，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对“两案”进行审判时，他被指定为“特别检察厅”厅长。在认真看了对丁盛的起诉材料后，他认为证据不足，建议不要把丁盛列入起诉名单。但是，他的意见被否定。

见到关心自己的老首长，丁盛格外激动。黄火青是一个律己甚严而又和蔼可亲的老革命家，他过着恬淡简朴的生活，屋子里摆的还是几十年前公家配的旧家具。这年他已是98岁的老人。

黄火青简单地问了丁盛的一些近况，便很快转入正题。他说，虽然他很久不工作了，但是还一直记挂着丁盛的问题。他对丁盛的遭遇深感同情和惋惜。他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争取使丁盛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他给丁盛出了个主意：当时正值印度进行了核弹试验，又在中印边境炫耀实力，丁盛曾在1962年参与

指挥中印边境战争，对中印边境地区和印军情况比较了解，不妨给中央军委领导写个报告，先对加强中印边境战备建设提出建议，然后再顺便提出自己的申诉。报告由他转呈，他也写个报告，提出对丁盛问题的处理意见，一并上报。估计这样比较容易引起领导人的重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丁盛随即按照黄火青的指点写出报告。考虑到报告的文字不宜太长，丁盛对加强边境战备建设问题写得比较简略，而另写了一份《对当前中印边境斗争的几点建议》，作为报告的附件。丁盛在报告的申诉部分，扼要地谈了他当前的困境，“今年 85 岁了，右眼失明，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甲亢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老伴又是一个老病号，动过 5 次手术。多年来，全靠子女和战友们接济生活。”他恳切表示，自己“热爱党，热爱军队”，“希望能回到党和军队中来，在有生之年能解决党籍军籍问题，并提高一点生活待遇”。

报告呈上去了，因为是黄火青具名，军委主要领导作了批示：请军委纪委调查了解情况后处理。但是，什么时候才能调查清楚？有多少程序、过场要走？需要多少时间？谁也说不清。在北京是等不起的。

丁盛夫妇只好又回广州等候消息。

等到 1999 年 1 月，丁盛在北京的那位热心的老友终于来信了。跟 5 个月前的情况相反，这是一封让丁盛泄气的信。这位老友的信一开头便写道：“两次请你们来京，事情都没办成，我实在感到歉疚，对不起故人。”事情没有办成，是黄火青让他身边的人通知丁盛这位老友的。据黄火青的身边人说，“黄老自己也感到难受，他（黄火青）说，‘今年办了两个人的事，都没有办成，感到对不起丁盛同志’”。黄火青原想先争取使丁盛恢复党籍军籍，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却是：“案不能翻，生活可以适当改善。”话说到这种地步，黄火青也无可奈何，只能慨叹“谁知结果是这样”！黄火青还得到通知：军委领导人的批示已形成文件，发往广州军区，届时有关部门会找丁盛落实批示精神。这位老友最后劝慰丁盛夫妇想开一点，“保持身心舒畅，至于历史的功过，任由后人评说，谁又能封住后人之口？！”

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心情怎能舒畅？不过，有人劝慰丁盛：政治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能先改善一下物质生活也好，物质待遇提高了，也有助于消除或减少一些人对丁盛的政治偏见。丁盛认为这意见不无道理。

但是，又等了半年，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7月11日，我又帮丁盛分别给黄火青的身边人和丁盛在热河时的另一位战友写信（先前那位老友到美国看望留学的女儿去了），反映了这一情况。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丁盛还没等来北京的正式答复，便突然病倒了。8月26日，他因高烧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医院诊断他患了肺炎。虽然按上面规定他只能住师职干部病房，但是医院方面对这位老司令员还是尽可能给予适当照顾；同时，丁盛的长女丁力是他所在科室的负责人之一，更使他得到许多慰藉。

丁盛住院后体温一直不退，但他精神很好，头脑清晰。9月初我去探望他时，他表示对治疗很有信心。其实，他对病情的凶险还是有所了解的。他曾对丁力讲，他知道，朱老总就是得他这种病去世的。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不详的预感，他和自己的亲人谈了许多平时他很少讲的往事与人生感悟。他说，如果他不参加革命，不过是一个放牛娃，所以，他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晚年他虽遭不幸，但是令他感到宽慰的是，过去的战友们都关心他，信任他；来到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工休人员都尊敬他，照顾他；自己的子女都很争气，他没有后顾之忧。当然，他也看到有些过去的熟人，现在见了他不大自在，有的人甚至和他“保持距离”，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事实真相，他理解人家的心情，要体谅人家；但是，对有人劝他“看淡一点”，他却说：“这话看怎么理解，如果是劝我不要消沉悲观，我赞成，如果是劝我认错认罪，那就是是非不分了，我没有的事，又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绝不能承认，不存在看重看淡的问题！”他对有关方面迟迟不处理他的问题，感到很不理解。他知道自己已是耄耋之年，来日无多，时间的优势不在他手里，他陪不起，拖不起，常常为此焦急。但他坚信，只要是共产党，迟早总会给他平反。

9月22日，在几十年的战争环境中体力严重超支，最后20年又备受屈辱，早已心力交瘁的丁盛，病情急剧恶化。医院把包括钟南山院士在内的广州几位著名专家请来会诊，最终仍无法挽救他的生命。9月25日，丁盛与世长辞。在丁盛弥留之际，他的妻子孟文虹和子女们曾给军委主要领导写信，报告丁盛的病情，并请求为丁盛平反，让这个一直心在共产党、心在军队的老战士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自然，这封信也没有结果。

困惑与反思

丁盛去了，他怀着莫大的遗憾去了。斯人虽逝，却留下了一串令人困惑、发人深省的问题。

大家议论最多的是，丁盛究竟为什么遭难？很多人认为，丁盛是在劫难逃。他长期在林彪、黄永胜领导下工作，在衡宝战役中率孤军插入白崇禧集团的心脏，为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立下大功，受到林彪嘉奖，以后又继黄永胜之后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这些原本辉煌的历史，当毛泽东把林彪视为“反党集团”的头子之后，对丁盛就很不美妙了。1971年8月底，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负责人时，曾问丁盛、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话绝不是随便说的。丁盛不该忘记，当时华国锋就在现场，华是以善于揣摩、领会毛泽东的意图而著称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大批原四野干部受到审查、处理，但因毛泽东曾讲过丁盛、刘兴元的好话，才使他们躲过一劫。然而事实证明，像他们这种经历的人，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长沙被接见的广州军区丁盛、刘兴元、卜占亚三人都被陆续“补课”，无一幸免。所不同的是，刘、卜被划入“林彪反党集团”，而丁盛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四人帮”分子。为什么要把丁盛和“四人帮”弄到一起？有人认为，这是形势使然，斗争需要，符合“大方向”。这样有助于深揭和坐实“四人帮”图谋掌控军队的野心。更何况丁盛在大军区司令员中资历浅，他在南京又是个“外来户”，只要上面给他定性、点名，不愁众人不一拥而上——当年批斗彭德怀、罗瑞卿、刘少奇无不如此，概莫能外。也有人说，丁盛这人说话、做事太冲，不会拐弯，不懂韬晦，有些人（当然不是一般人）早已对他不满，他却浑然不觉。他挨整是早晚的事儿，但绝没想到他会成为“四人帮”分子，这可真是……

最早把丁盛“端”出来时，华国锋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他（丁盛）的话有记录可查”；以后，军事检察院的“决定书”也说，丁盛的“罪状”“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是，不管丁盛本人或他的亲属如何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却始终不肯拿出为丁盛定罪的任何证据。这不仅使丁盛和他的亲属不服，许多关心此事的局外人也深感诧异：既然丁盛不肯认罪，又申诉不断，何不把证据亮出来，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既可让丁盛老实认罪，又可教育广大群众！

丁盛不断申诉，有关方面多数情况下不予置理，当不得不答复时，则说：上

面有“精神”，为了保持安定团结，凡是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已作过处理的，一律不再处理。这就奇了，且不说“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种提法本身就很不正确，是一种极左政治术语，关键是这两次“路线斗争”情况极为复杂，谁敢保证件件处理正确？倘若错了，为什么却“一律不再处理”？不是讲“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吗？不是讲“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吗？不是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吗？为什么新的“凡是”就是金科玉律，冒犯不得呢？至于说什么“安定团结”，岂不知物极必反，不平则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明知有问题而置之不理，只会增加不安定因素，何来安定团结！

丁盛的遭遇令许多老干部为之不平，更有人为之奔走呼吁，虽然收效甚微，却让丁盛深受感动，得到莫大宽慰。这些人几乎都是已离休的无权者，因而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尽管可能反映民意，却未必能引起重视。而一些当权者，则对此事采取了极为谨慎甚至冷漠的态度。特别是有几位丁盛当年的部属，在丁盛申诉的后期都位居要津，他们对丁盛的基本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也应该看到丁盛的申诉材料。他们确实无权为丁盛彻底平反，但也绝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然而，可能是为了避嫌，他们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不知这是否也是中国特色？

尾声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提倡“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丁盛是个有公民权的人，一生又出生入死、竭智尽忠，为共产党打江山，自然应该为他开个追悼会。经过请示，有关方面答复：主要由亲属办理。既开追悼会，就得发讣告，布置灵堂。讣告和灵堂的横幅该如何称呼丁盛？亲属按惯例拟写“丁盛同志”，不料，过去对丁盛的申诉或者没有反应，或者反应慢得出奇的有关方面，这次却反应奇快：不能称同志！为什么？没作解释。那么，丁盛是1955年授衔的少将，“决定书”并没宣布剥夺他的军衔，可否称为将军？也不行！丁盛是1930年的红军，他出事之后南京军区只是宣布“命令”他“退出现役”，并没说开除军籍，称老红军总可以吧？答复还是不行！

丁盛的妻子儿女们一起商议该怎么办，大家都犯难了，总不能就叫丁盛吧？

我被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家庭会议。我搜索枯肠，提了个意见：中国有尊老传统，老作家巴金、冰心，他们晚年大家都尊称为巴金老人、冰心老人，一位著名女歌手唱的一首歌中，也称邓小平为老人，我看就叫“丁盛老人”吧！大家议了一阵子，虽然觉得不太理想，最后还是都同意了。

不少人认为有关方面的决定太不近人情。有些不知内情的人，以为“老人”的称呼也是官方定的，以鄙夷、揶揄的口气说：“哼！真想得出，来个‘丁盛老人’！”我听到后赶紧声明，这是我的建议。对方马上换了口气：“你还真能发明创造呀！”我只能苦笑。

1999年10月7日，“丁盛老人”的告别仪式在黄花岗殡仪馆大厅举行。几百人挤满了大厅。参加者都是自发来的，不少人来自外地。没有一个在职的领导干部到场。灵堂四周摆满了花圈，花圈飘带上写的对丁盛的称呼因吊唁者的身份而异：同志、将军、老首长、司令员……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丁盛老人”。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这是毛泽东于1967年5月对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区两个反映“支左”情况报告的批示。毛泽东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两个单位对“造反派”支持不力，要求军队改变观念，跟上形势，真心支“左”。毛泽东的批示是不对的，“造反派”是什么货色？他们已经以自己的行动为自己作了结论，毛泽东在作批示后仅一年多时间，便也公开表示不再支持“造反派”了。但是，此话的一般道理还是对的。用于对丁盛问题的处理也很贴切，有针对性。所以，我用此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2008年3月5日上午于广州

【风云人物】

与马、徐、王谈话的真情及我的自白

丁 盛

按：这是丁盛于1985年11月15日写给上级领导的一封申诉信的附录。他在信中说：“仅凭我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一个晚上的谈话（马、徐、王就

此捏造出的假口供详情见附页)，就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据这假口供判定我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罪，这与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为此，他对这一罪名所谈事实的真相作了自己的回忆。本文由《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的整理编注者余汝信提供。

（一） 去上海的目的以及 76 年 8 月 8 日与马、徐、王怎么见面的。

七五年我心脏病复发，遵叶帅的指示，从九月至七六年二月，一直在南京中山陵养病。讹传我不听叶帅招呼，去了上海治病，这不是事实。

七六年八月，军区八九月份要在上海、杭州湾搞陆、海、空演习——这是由总部批准，有各大军区及总部的人参加，军区领导也全部参加的活动。这样，我因工作去了上海。

七月三十日，我离宁经上海视察演习部队及附近海岛部队。八月八日坐了一天海船到长江口大小洋山，李宝奇（上海警备区政委）到那儿接我。抵达上海，李宝奇问我：“你来了上海，要不要告诉上海市委？”我说：“不要。”九点多，我在延安饭店准备休息，秘书陈长顺告我：廖汉生政委的张秘书来说：“廖政委明天请上海市的医生会诊，要我给上海市委打个电话，以引起他们的重视。”陈秘书因我劳累要休息，想请党办李主任打这个电话，张秘书说还请司令打好，我就按这一要求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不久，陈秘书告我：“市委来电话说马、徐、王要来看你。”十点左右，他们来了，闲谈了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去看了廖政委。

就这样，客观因素促成我意外地见到马、徐、王，决非我有意安排要见他们，而达到所谓密谋的目的。

（二）八月八日晚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一见面，彼此寒暄：“你们这么晚了，还来看我。”“应当。”“从哪儿来？”

“从海岛来。”

我说了视察海岛的感受：“从长江口以东以南的地形看来，屏障多，兵力密度大，敌人（指外来侵略者）若想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老路，肯定要失败的。而长江口以北，以东的地形我从没去过，但听说水网地区，没山作屏障，兵力密

度小，这个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要去看看。”

我说：“这次我们部队要搞演习，要来很多干部，在车辆、交通秩序、副食品供应上都希望市委协助解决，要麻烦你们了。”

马说：“应当，不成问题。”

我说：“进长江口，水浅，大货船进不来，李先念同志讲过：每年罚款多少亿，你们挖个深水港多好呀！”

我问：“你们很忙吧？”

马说：“很忙，搞生产，忙给唐山运物资，这次唐山地震很厉害。”

马、徐、王主动提起：“军区七月份党委扩大会议开得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是检查部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工作的会议，是错误的）。你们军区领导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吧？”

我说：“是一致的。”

马问：“魏金山（六十军政委）怎么没参加这次会议？”

我说：“他有病，住院了。”

马说：“上警的一个副司令董常云思想不通，他现在出差了，等他回来后，我们要批评他的。”

马又问：“李宝奇同志是怎么来上海警备区当政委的？”

我说：“是军委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党委提议来上警当政委的。”

马问：“李宝奇这个人怎么样？”

我说：“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你看怎么样？”

马说：“李说话圆滑些，他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过，他和刘耀宗不一样（上警另一政委），刘是直筒子，有什么说什么，对就对，错就错。”

马又问：“刘耀宗哪儿去了？”

我说：“他有病，在黄山休养。”

马说：“欢迎刘耀宗回上海工作。”我没答话。

我说：“我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经常发作。”

马天水指著徐景贤说：“可以安排他去华东医院检查一下。”

“好，谢谢。”

坐了近一个小时，我们一块去看了廖政委。

他们有意打听上警干部及军区会议的情况是别有用心。当时我只把他们当上海市委领导看待，没能识破他们反革命面目，失去警惕和防范，这是我的错误。

（三）九月三日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九月三日，十点左右，马、徐、王没打招呼，突然来延安饭店我的住处，我问：“你们来干什么？”马说：“最近有两批较多的外宾要来，看延安饭店的宴会厅是否容纳得下。”我说：“可以去看看。”

他们坐下来，我说：感谢上海市委给予军区这次演习的支援和帮助，马天水说不用感谢这是应该的。

马说：“市委给你们转去一封信，是无锡部队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你们收到这封信没有？”

我说：“收到了”。

这时我告诉他：“我们也收到了一封信，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给某医院护士的。”他在信上说：“毛主席百年后要打内战。”我说：“打内战可不得了，我们已将这封信送中央了——送给陈锡联同志。”

马天水说：“我们也收到了类似内容的一封信，也送中央了。”

这事就说了这么几句。

（四）军事检察院的免于起诉书（下简称“决定书”）说：“八月八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他们说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布置。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发了各种枪支弹药。这就构成我参与密谋武装叛乱罪。

（五）下面请组织听取一个老战士对党的自白：

（1）关于六十军的问题：

“决定书”上说：“我最不放心六十军”“六十军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事实上八月八日晚谈话，除问到魏金山（六十军政委）哪儿去了之外，根本就没有提到六十军。

至于我说的长江口以东以北的地形，完全是从上海的海外防御角度说的。与在上海以西京沪线上的六十军没有任何关系。马、徐、王的供词说我对六十军“很担心”，这完全是移花接木的栽赃，彻头彻尾的捏造。

说我说：“这个军我指挥不动……在宁沪线上，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我身为大军区司令，对下属部队根本不存在调动调不动的问题，事实上，我刚顺利完成了对六十军的调动。

我感到六十军的一个师配置在交通条件较差的淮阴一带，便提出将该师调到无锡市，经军区党委讨论，总参批准，七六年上半年该师调防，六十军军部也从江浦调到镇江。若说：“对上海是个大威胁”，这个“威胁”不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吗？真是无稽之谈。

(2)“决定书”上说我表示：“准备杀头”，这更是荒谬绝伦。我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有职有权，工作顺心，上下团结，情绪很好，心情愉快，神志清醒，我怎会出此悲观的混账话呢？八月八号的谈话，除相互吹捧，并没有议论中央领导，也没有谈论全国的形势，我想的是演习，谈的是演习。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准备杀头”之类的话。

我在谈到什么问题时说“准备杀头”？它的前言后语是什么？它总不会是孤零零的一句话吧？！

(3)“打内战”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信的内容，怎么成了我和马、徐、王谈了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本是九月三日晚上的谈话，硬不顾客观事实，给安在八月八日晚上；是为了证实八月十一日马、徐、王的突击发枪，是谈及“打内战”而引起的，好加予我策动叛乱的罪名，这样又制成一个错案。

(4)我和马、徐、王的关系：

我和马、徐、王过去不认识，七四年调南京军区工作后，在上海接触过三次，第一次是七四年三月，从舟山视察部队回南京，路经上海，晚上我们初次见面；第二次是七五年一军和二十军调防路过上海，王秀珍请我吃过一顿饭；第三次就是七六年八月八号晚和九月三日晚的两次谈话。在这前后，我们既没有工作上的联系，也没有任何书信、电话及私人交往。九月六日接到毛主席病重的电报，要我返宁，我去市委告别，如有谋反之意，这是密谋的最好时机，可我只告别一声就走了。从那以后，没有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请组织详细调查我这一个多月的

活动情况（从九月三日到十月八日）。

粉碎“四人帮”，我才认清了马、徐、王的真面目：他们蓄谋叛乱，早就狠抓上海民兵多次发枪。马、徐、王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武装叛乱，搞武装叛乱是他们反革命思想本质的大暴露，怎能无端归罪于我的一两次谈话，受我的影响呢？反革命分子马、徐、王的口供决不可信，他们为减轻罪责，妄图嫁祸于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总政检察院、法院的三名干部在八二年六月审理我的问题时，不听我叙述的事实，而相信马、徐、王的口供，他们说：“毛主席说审查干部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你的问题虽没别的证据，而马、徐、王的口供就是证据。”

请组织相信一个老红军战士的自白，绝不要轻信马、徐、王造反派的为减轻罪责，而嫁祸于我的假口供。

我今年已七十二岁，去年摔伤后三次住院。近况不佳，身体很虚弱。承受“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枷锁，殃及家属孩子。更痛苦的是多次申诉，无人受理，给组织的信，都石沉大海，我越来越感到生命危在旦夕，渴望在瞑目以前能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过问。让我去北京澄清自己的问题，并盼望解决我目前生活上的困境，党虽在组织上处理了我，可我仍坚定不移地相信党，依靠党，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我的问题。

【学术研究】

银幕中心的“他者”

——革命样板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节选）

宋光瑛

按：此文选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宋光瑛女士的硕士论文。原论文除中英文摘要、前言、结论外，共分四章。本刊选登其中文摘要，前言和第二章。

摘要

本文以革命样板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性别批评的方法,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基础,联系符号学、叙事学、神话学等多种文艺理论,以服饰、身体、欲望为关注焦点,多角度地揭示样板戏电影中女性形象被建构、被想象的方式与途径。本文旨在通过对该时期女性典型艺术形象的研究,在历史语境和文本叙事中,去分析这个审美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理解。论文在揭示文本蕴涵、呈现的男权意识和性别权力关系的同时,辨析性别话语和革命/阶级/国家/民族话语的互动与转化,挖掘女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凸显女性内部的种种差异。通过对样板戏电影这个文本的细读,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女性形象建构既有着强烈的现代性,又具有浓厚的封建伦理内涵及其特征。论文尤其注意凸显样板戏电影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这种独特性,指出了这些女性形象不同于以往之处。本文除前言、结语外,包括四部分内容,分见第一、二、三、四章。

前言是对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目的和意义的简单说明。

第一章结合服饰细节具体分析了四种不同的女性形象:红头绳、白毛巾、蓝围裙和灰军装,论述了这四种女性形象的不同意识形态内涵,并结合它们不同的社会背景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得出四种不同的性别定位。

第二章以梅洛·庞蒂和米歇尔·福柯两位学者的相关学说为理论前提,关注样板戏电影是如何想象女性身体的,揭示电影中所存在的压抑、禁锢、折磨、利用身体的种种方式。本章第一节研究女性身体与政治的关系;第二节研究女性身体与创伤;第三节通过样板戏电影中欲望的变形折射,指出了传统伦理道德和当代政治观念给人们的性观念造成的双重压抑。

第三章关注样板戏电影的叙事与意识形态、视点运用与权力话语、修辞策略与叙事操纵等方面的问题。第一节揭示出即使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女性被压制和遮蔽的境遇也没有随着革命的成功而改变,男性操纵着革命话语对女性施加了新的政治功能压力;第二节在具体描述了女性话语在叙事文本中的性别“边缘化”特征后,揭示了男权文化剥夺女性话语权,将女性禁锢在男权礼教中的真相。

第四章从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探讨样板戏电影中的女性神话主题,讨论了样板戏电影在银幕上所创造出的受难女性、伟大母

亲、女统治者等女性形象，同时揭露样板戏电影这种传播最为迅速、最为广泛的大众叙事形式是怎样“讲述”历史、重塑神话、改写记忆以及遮蔽女性历史真相的。

结语部分是对样板戏电影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归纳，本文论证了样板戏电影中女性在“女性解放”之路和“男女平等”的时代呼声中形成的女性形象“无性别化”特征和女性性别意识的历史性缺席，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在样板戏电影中，新女性形象建构的实质是——她们仍然是人类历史中的“他者”。

前言

新中国电影史是一个相当丰富的研究对象，它因起伏不定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呈现出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因中国影坛独特的“代”际划分现象而带来艺术形式和美学追求上的多样性，而在不同时期和历史阶段，都会有一些独特的文本以“经典”的姿态出现和流传。“革命样板戏电影”便是这样一个诞生于特殊历史时期因而有着特殊艺术样式的典型文本。

样板戏电影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从类型上来说，样板戏电影应该属于舞台纪录片，它的诞生与 60 年代的京剧革命现代戏实验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伴随着样板戏（注 1）的创作和普及，样板戏电影可分为三批，第一批的八个影片包括六个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1970）、《红灯记》（1970）、《沙家浜》（1971）、《奇袭白虎团》（1972）、《龙江颂》（1972）、《海港》（1972-1973）和两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1971）、《白毛女》（1972），这八部影片一出世便以一种绝对的姿态占领了中国银幕，共同打造了样板戏电影的黄金时代，成为政治高压下的艺术真空地带的幸运儿和一个时代别无选择的主流文化代表；紧接着第二批样板戏中的《杜鹃山》（1974）和《平原作战》（1974）也被搬上银幕，而此时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样板戏电影不仅在数量上锐减，艺术上也如强弩之末，日趋衰微；最后一批样板戏电影包括两部舞剧《沂蒙颂》（1975）、《草原儿女》（1975）和一部京剧《磐石湾》（1975），这几部样板戏上映后反响平平，再难重现当年的风光。1976 年之后，样板戏电影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退出历史舞台。

“革命样板戏电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仅从名字我们就能领

会到它的复杂多义：“革命”二字先给它贴上了政治与文艺相结合的标签；而“样板戏”本身就是以传统戏曲样式表现现代工农革命题材的大胆尝试，它与“电影”的结合又势必创造一种“还原舞台，高于舞台”（注2）的艺术形式；“三突出”、“四字诀”之类的艺术教条又给它蒙上了一层荒诞色彩（注3），而它所表达的突出且露骨的极“左”文化观念亦使其自身存在着无法掩盖的裂隙。放眼中外影史，我们很难找到能够与之媲美的，从形式到内容如此偏执、极端的电影。样板戏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形成了“文化专制与艺术精致集于一体”（注4）的高峰。本文并不打算对样板戏电影做这样全面的研究，而是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视角——运用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从性别角度剖析样板戏电影。

在上文列出的13部样板戏电影中，以女性为第一主人公和叙事中心的就有6部：《龙江颂》、《海港》、《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杜鹃山》、《沂蒙颂》，其中还不包括在后来改戏过程当中让出第一主角地位的《沙家浜》和《红灯记》以及将原故事中的两姐妹改为两兄妹、对女性力量进行强行置换的《草原儿女》。在相对单一的艺术形式（京剧或舞剧）和相对单调的题材（革命战争或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样板戏电影描绘了多种性格特征的女性形象：温顺的（英嫂）、活泼的（铁梅）、爽朗的（方海珍）、泼辣有心计的（阿庆嫂）；从年龄上来看，其跨度之大从女童（《龙江颂》里的小红）直到老妇（沙奶奶、李奶奶等），其中又包括未婚、已婚和守寡单身（柯湘）等多种生活状况之下的女性，由此，样板戏电影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女性群像。这些主要是工、农、兵身份的女性，虽然在社会阶层上不够全面，但却是当时那个社会的主体，这些女性的行动和表现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性别观念，因此，从女性研究的角度来说，样板戏电影完全可以构成一个独立自足而又丰富多义的文本。

女性主义曾被定义为“对妇女屈从地位的批判性解释。”（注5）而女性主义理论在电影批评中的实践，自劳拉·莫尔维(Laura Mulvey)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1975）引领先河以降，在中西方的声音都越来越响亮，也越来越学术化和规范化，俨然成为一种切入文本的有力介质，其根本目的在于“瓦解电影业中对女性创造力的压制和银幕上对女性形象的剥夺。”（注6）本文便采用了这样一种特殊的视角，对人们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进行“抗拒性阅读”，解构其在

文化中对女性他者形象的建构。这种名符其实的经典重读，不仅意味着新鲜理论的浸染和介入，更是对旧有资料的重新占有和梳理，以及从全新的角度上对其所进行的新的批评与阐释。正如美国诗人和批评家艾德里安娜·里奇所言：“重读——一种回顾：以肉眼审视和新的批评方向进入过去的文本行为，对女性来说不仅能开创文化历史新的一页，更是一种自救的行为。”（注7）希望不管是本文的写作还是阅读都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占有，对深刻内在于其中的男权文化予以揭示、解构和重写，从观念上而非事实上改变以歧视或者说无视人类的一半为前提的文化性别等级。本文试图以这样一个小巧但却犀利异常的刀锋游刃于一个庞然的曾经坚不可摧的舞台样板和银幕“圣经”之中，质疑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同时揭露样板戏电影这种曾经传播最为迅速、最为广泛的大众叙事形式在再现、反映、刻划、塑造女性及讲述故事时是怎样扭曲、遮蔽最真实女性的。

样板戏电影这个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新中国电影历史高峰的特殊文本一向以艺术上的自我满足和意识形态的过分强化而遭人诟病，以至于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达成共识：它必须受到攻击。因此，本文不过是在一个旧战场上打响一场新战役罢了，而在方法论上，笔者试图遵循这样一种策略：女性主义不是一种理论的俯瞰和预设，而是一种深刻而细致的内化分析，通过对文本的细读（close reading），揭示在革命样板戏电影之中，女性形象被建构、被想象的方式与途径，从深度罅隙里找到一个被历史所忽视的女性群体。如果避开“革命样板戏电影”外观形式的高度统一性，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影片布满了小小的裂缝，那是在一种内在的张力之下露出的破绽。这些细小的裂缝，一方面完全遮盖在那个貌似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之下，另一方面却从内部暗中拆解了那个体系，瓦解了样板戏电影许久以来牢不可破的建立在男人、国家和历史概念上的宏大叙事，凸显出在主流意识的泯灭和绞杀之下不自觉突围出来的女性特征的原初生命力。同时，本文也不缺乏“远观”（stand back）的角度和眼光，在女性主义视角的基础上我们将结合符号学（sémiologie）、叙事学（narratology）、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等理论将样板戏电影放到文化整体当中去进行宏观的考察，在历史语境中辨析性别话语和革命/阶级/国家/民族话语的互动与转化。

革命样板戏电影作为“革命的话语”的一部分，不仅挟革命的威力，扫荡了

一切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不符的阶级成分，也意味着对性别角色的重新配置。正是这种新旧话语产生巨大断裂的关头，给性别关系的调整和就位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正是本文关注和剖析样板戏电影的主要原因和关键视点。本文将在揭示文本蕴涵、呈现男权意识和性别权力关系的同时，挖掘女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凸显女性内部的种种差异，并最终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在与无产阶级革命交叉在一起的中国女性革命的进程中，女性的真正主体始终被男性统治的党和国家政体边缘化和客体化，使女性最终成为一个游离于历史中心之外的“他者”。

第二章 样板戏电影中的身体与女性形象

对于“身体”的关注被认为源于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他的《知觉现象学》（1945）一反哲学关注形而上的传统之道，以形而下的身体为关注点，开创了哲学史上的“身体现象学”。而“身体”研究在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学术热点却得益于福柯，他通过“政治解剖学”或“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揭示了身体卷入政治领域的途径，其对“驯服身体”和制造“驯服身体”的规训实践的描述直接启发了女性主义者的思考。

福柯认为，“身体不是一个自然的存在，而是文化和权力的对象和目标。”（注8）事实上，身体一直是并且仍将是权力规训的对象，是各种意识形态争夺的目标，而当女性被纳入国家/民族/阶级解放的宏伟革命蓝图之中时，女性身体也成为革命的力量与目标，因此，在样板戏电影中，女性身体的处境更为复杂和尴尬，在潜在的传统男权文化和显在现代革命话语的双重规训之下，女性的身体呈现出特殊的形态也具有独特的能指。

第一节 变态的身体

在文本结构和文化的含义上，电影同人的身体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征兆的运作，电影如何对待、构造、展示并操作身体往往能够引发多重含义，就女性身体而言，最常用的含义通常有两个：体现欲望的身体和体现政治含义的身体。前者可以举好莱坞电影和深受其影响的中国早期电影为例，其中的女性主人公大都是男性欲望的指认对象，她们被动地处在男性凝视的目光之下，只是作为纯粹的色

情观赏物编织进情节中，被简单地纳入父系威权代码系统而无奈地承受男人的性别压制和性剥削。而作为新中国女性的代表，样板戏电影中的女性已然成功逃脱了男性视线对影片的形象性控制，她们那服务及产生于劳动的结实粗壮的身体和朴素无华的衣着使她们得以从“被看”的窘境中暂时解脱出来，使影像的安排不再屈从于男性的色情幻想。这样的身体显然更像是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所说的“干净得体的身躯”（corps propre）（注9），而克里斯蒂娃认为干净得体的身躯其实是作者与观众观看时的各种想法之间交流互动的综合产物，它本身就寄寓着某种掺杂杂质异物的理想主义。也就是说，这样的身体其实是被意识形态所侵犯的身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样板戏电影中的女性最终无法摆脱一种“客体化”的命运和“他者化”的性别配置。女性通过使自己从意识到身体都更加男性化的方式来实现平等，男性则在此过程中巧妙地实现了对女性的“精神（政治的和性别的）殖民”。

革命样板戏电影中的女性大多衣着朴素、身材健壮、浓眉大眼、孔武有力，呈现出与传统女性美截然相反，向中性化或男性化靠拢的趋势，其极端是对女性气质的彻底改写。如《杜鹃山》中柯湘的几次亮相：“柯湘戴铁铐，昂首阔步自大门内上，侧身甩发，迈过门坎，巍然屹立，气宇轩昂，‘亮相’”，“拨开刺刀，冲出刀丛，举链击一团丁，转身‘亮相’”。这些动作不仅阳刚气十足且大有胜君一筹之概。《杜鹃山》里就有个场面专门描写柯湘轻而易举制服了轻视她的男性——邱长庚。郑老万钦佩地称赞她是：“打仗干活，行家里手。”而柯湘描述自己是：“风里来，雨里走，终年劳累何所有？只剩得，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同样，在《海港》中，方海珍也被塑造为一个壮如铁塔、声如洪钟的女干部，一个毫无审美价值只余政治宣传价值的扁平人物。革命样板戏电影中女性的舞台造型常用的是弓箭步，右手不是高扬向前就是握拳在胸，完全是一副大无畏的革命者的姿态。无疑，从类似这样的身体我们是很难确定其女性身份的，她们身上更多的是男性化的特征而少有“女人味”，而恰恰“女人味”才是对女性自身生理、心理特征的尊重。按照波伏娃的观点，男性与女性无论从生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是存在差别的，这也是女性主义批评者们早已认识到的问题。而样板戏电影从身体外观上不由分说地抹杀了这种差别，其实是对女性本身的忽视和伤害。这种身体表现可视为一种变态，——“变态”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存在所谓“正常”的标

准——变态则意味着“反常”。变态不仅包括生理性别也应包括社会性别，而这一分类有赖于文化、历史、行为以及精神多方面的关系，变态的身躯所变换的是人物相对于社会和文化而言的性别身份。就性别而言，正是性别身份上的差异性导致了变态这个说法，正是女性的他者（他者化）的地位导致了其变态或被视为变态的可能。由此，在阶级论述的掩盖下，性别权力关系得到巩固，在阶级话语和男权文化的双重建构中，理性女性呈现双重气质。

第二节 被虐的身体

在革命样板戏电影当中，对女性身体意义发掘和利用的另一个途径是：伤害女性身体并加以展示。样板戏电影更喜欢让女性充当受难者和被拯救者，并乐于让观众观赏她们流血的伤口(bleeding wound)。如《红色娘子军》一开始便细致入微地表现皮鞭和锁链之下的女性身体，并让找到红军之后的吴清华第一个动作就是公然展示自己的伤口。那段清华“诉苦”的舞蹈被演绎得细致动人：她先是面向观众（镜头），对连长侧身拉袖，露出伤痕；随后背着观众（镜头），低下身来给娘子军连的战士和群众看伤。这种对女性受伤身体的象征性施暴和虐待狂式的展示，在表现阶级仇恨的背后，隐藏的是患有厌女症(misogyny)的男性对女性的态度，通过对女性身体的虐待并使之受创，象征性地克服了男性潜意识中无法正常控制女人所带来的去势恐惧。这种仪式履行的功能是“专心搬演那原始的创伤（检查那个女人，把她神秘非神秘化），通过对有罪的对象的贬值、惩罚或拯救来加以平衡。”（注 10）弗洛伊德曾明确指出，“女性受虐”的实质就是一种建立在男性中心的秩序之上的文化类型，这种受虐狂模式，是“完全建立在原始的色情受虐的基础上的，是在痛苦当中感受快乐”。（注 11）而其中，男性气质享有特权，女性则被定位为异类。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在《受虐狂的系统问题》一文中提到了受虐狂的三种不同模式：色情受虐、女性受虐和道德受虐。如果说建立在色情受虐基础上的女性受虐的幻想表现了“以被窒息、被捆绑、被痛打、被鞭抽、以某种方式被虐待、被强迫无条件服从、受污辱或是被贬低等方式，而获得直接的满足。”（注 12）这个充满罪恶感的过程无疑又会导致第三种受虐类型——道德受虐，这种施虐-受虐的凝视模式无疑能够有效地操

纵、逆转观众的道德观念和评价，成功地将剧中的施虐者南霸天（地主、恶霸和国民党附庸的代表）拖入道德泥沼，使无产阶级获得道德上的绝对主动权，从而以女性流血的伤口和身体为阶建构起主流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观念，并最终获得性别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制效果。

另一个典型的承受身体虐待的女性形象是《白毛女》中的喜儿，她所遭遇的痛苦不仅包括一系列身体虐待——奸污、受孕以及山野产子，甚至还有更加非人的待遇：满头白发，成为非人非鬼的“白毛仙姑”。这种“女性/怪物体” (the monstrous-feminini) 的变态想象无疑是身体虐待的极端。虽然从歌剧到电影到样板戏，文本不断修改和掩饰了这种“虐待狂”般的情节（注 13）——到了样板戏电影中，她甚至连那场招至厄运的强奸也幸免了，但那个身披白发的妖魔化的女性形象却永远留在了新中国的记忆中，一如那个精怪般的名字——“白毛女”。这种“女性/怪物体” (the monstrous-feminini) 的变态想象其实是对卑贱者 (the abject)、他者 (the other) 的典型再现。“卑贱”这一概念出自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著作《恐怖的力量》 (Powers of Horror)，她认为“卑贱干扰身份、系统、秩序，它是‘意义崩溃的场域’”，（注 14）而女性的卑贱概念原本与她的再生产和母育功能有关，卑贱身体的原型是母亲的身体，因为它流血、生产、被刺穿——而 these 与阴性有关的虐待在《白毛女》中无一遗漏的发生在喜儿身上。“女性/怪物体” (the monstrous-feminini) 变态想象演绎了男性主体对母亲与女性身体特有的、混合了既迷恋又厌恶的复杂情绪，是男性在欲望过度宣泄后对女性的惧怕的潜意识流露。

第三节 压抑的情欲

一个久已为人发现的事实是，样板戏电影所塑造的样板人物是一群只有革命激情而不识人间烟火的英雄儿女。首先，正面人物的情感婚姻被完全忽视，原文本中的恋人们如洪常青与吴清华、大春与喜儿都被改为同志关系，柯湘的丈夫早牺牲，方海珍与江水英同为大龄女子。另一方面，样板戏原文本中所有的“坏女人”形象都被下令取消（如《智取威虎山》中勾引杨子荣的座山雕的干女儿“玫瑰花”），对观众而言，这是他们的观影兴趣大打折扣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些银幕

上的“坏女人”不仅政治反动、思想落后，而且往往道德败坏，打扮妖冶，对于男性观众而言，她们难得地满足了他们潜意识中的“窥淫癖”；而对于女性观众而言，其敢于大胆突破传统性别规范的行为也令她们表面鄙夷实则暗羡。而在样板戏电影中，所有与情欲有关的情节都被否定和抹消，为了保证革命文本的纯洁性，连《白毛女》中一直被当成黄世仁恶的极至的“强奸”也被抹掉了，不管善还是恶，革命还是不革命，作为人性一部分的情欲被彻底地屏蔽了。

样板戏电影对情欲态度的纯粹和决绝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有学者曾敏锐地指出革命/情欲二者之间的关系，“革命初期需要借助性的冲击力摧毁传统体制，而当革命进入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严密过程时，禁欲却成了持续革命的保证。”（注 15）新中国电影中爱情/性与革命的关系正是沿着这样的轨迹波动，在表现革命开始和蓬勃发展的时候，银幕上不乏《柳堡的故事》那样的浪漫和《战火中的青春》那样的激情，而到了极左激进思潮兴起之时，人情人性便成了文艺作品中的大忌，到了文革电影中，人们的七情六欲更被严酷的体制剥夺殆尽，所有的激情只有一个出口——革命事业。在主流话语中，情欲的匮乏并不足以成为一个显在而重要的问题，似乎只有革命才是个人真正的依托和归宿。

这种被极力压制的情欲一方面转化为澎湃的革命激情，另一方面，却像潜藏的暗流寻找着新的出口，使得貌似神圣、高尚的革命样板戏电影终未能完全超脱于世俗之外，如果说白毛女的故事已经有了几分“始乱终弃”的世情小说的痕迹，吴清华也以女性的肉感身体穿行于一个关于革命往事的讲述之中，那么阿庆嫂则以其特有的成熟练达、八面玲珑的风情和周旋于多个身份各异的男人之间的智慧勾引起观众多少有些无中生有的暧昧猜想。

样板戏中的女性大多朴实、单纯，绝少情感羁绊和复杂的心理波澜，但《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却是个例外，她不仅毫不羞怯地把在上海“跑单帮”的丈夫挂在嘴上，而且利用性别优势在汉奸和国民党之间左右斡旋，极有城府。阿庆嫂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样板戏当中显然是一个特例，她甚至是唯一一个不以阶级身份而仅靠个人魅力博得观众认可的革命者形象。作为一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女性，她其实更像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如何仙姑、观世音，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总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她是中国民间审美传统的魅力在样板戏中的一脉隐线，这种对中国底层观众观影趣味的潜意识迎合是《沙家浜》在众多样板戏

中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阿庆嫂的地上身份是春来茶馆的老板娘，这一职业在旧社会属于“下九流”，在当今也被归与即使并不低下但至少决不会令人产生高尚感的“服务行业”，因此，不管其在革命工作中发挥了多么重大的作用，她依然被塑造成一个更民间更世俗化的形象，其言行举止不卑不亢之余沾染着重重的风尘感和江湖气，既有“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豪爽，也有“人一走，茶就凉”的世故。她不像一个“标准”的革命者那样满口语录和豪言壮语，相反却很擅长察言观色就坡下驴甚至撒泼使气，她和沙奶奶的那场假戏真做的厮打令刁德一这样一个老奸巨滑的特务也哭笑不得毫无办法。她与胡司令的关系虽然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性意味，但在严格杜绝男女之情的样板戏电影中，这种相互扶持信任的“私交”还是不可避免地有了些许暧昧色彩。如此一来，在胡司令的庇护和重用之下，阿庆嫂对郭建光的选择就构成了一种变相的背叛或“偷情”，其行为在人情而非政治上的“不义”抑或“不贞”使其成为革命样板戏整洁一致的女性队伍中一个极其罕异的“荡妇”形象。

《智斗》一场中，阿庆嫂、刁德一、胡传魁三人之间的那段对唱至今仍是样板戏中最受观众欢迎的唱段，这段以传统的“背供”手法处理的旦、生、净三种角色的对唱，巧妙地表现了三方复杂微妙的关系，玄机暗藏，高潮迭起，而这段对唱却被当代观众理解为一种隐秘含蓄的调情：“在样板戏中，人们就不爱看《平原作战》，人们最爱看的是《沙家浜》、《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沙家浜》中的‘智斗’说穿了，实际上是女人与男人的调情，只不过是伪装得很巧妙的一种调情。”“阿庆嫂是一个处在两个男人之间的女人，一边是胡司令，一边是郭指导员。阿庆嫂以前曾经救过胡传魁，当她转向郭指导员的时候，观众也就在不自觉中接受了创作者要灌输给我们的‘十八棵青松’的思想，阿庆嫂对郭指导员的选择是以政治选择的伪装呈现出来的，观众认同了阿庆嫂的选择，也就认同了政治的选择。”（注 16）在这里革命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言情故事——革命的与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男性对女性的争夺，不同的政治派别较量在情场上的表现，性的魅力与政治的魅力、性征服与政治征服呈现为一种互为转喻的关系。在这种似是而非的周旋中，阿庆嫂那副本来就不够样板的革命面具下也显隐出一层女子的色情本相，这种形象建构与好莱坞电影中的荡妇无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满

足观众隐秘的的观淫欲望，而在被看之外，女性的主体性早已被置换和抹杀，她始终无法进入主流叙事，无法真正走到革命舞台的中央。

小结

在革命样板戏电影中，主流意识形态致力于建构新中国新女性的新形象，而将女性身体与革命话语的对接，是样板戏电影建构女性形象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样板戏电影也以颠覆性的激情塑造了江水英、方海珍等新时代的新女性，但是就对女性身体的“工具化”使用而言，样板戏电影与好莱坞主流电影及中国早期电影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对于样板戏电影中的女性而言，她的身体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它只是叙述者用来表征她的思想的符号。样板戏电影首先把女性身体视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在想象中建构出健壮有力，呈现双性气质的变态身体参与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其次，传统的男权话语又不时与上述解放话语相缠绕，在阶级叙述的荫底下，潜藏在男权文化中的观淫和厌女情绪得以曲折流露，样板戏电影中的女性身体铭刻着深深的意识形态争战的痕迹。

注释：

注 1：关于“样板戏”：所谓的“八部样板戏”是指江青 1967 年 11 月 28 日册封的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第二批革命现代戏问世于 1970 年前后。它们是钢琴伴唱《红灯》、钢琴协奏曲《黄河》、京剧《杜鹃山》、《龙江颂》、《沂蒙颂》、《平原作战》及《磐石湾》。“样板”一词现被认为首见于 1965 年 3 月 16 日的《解放日报》，在署名为“本报评论员”的文章《认真地向京剧〈红灯记〉学习》的短评中写着：“这是京剧革命化的一个出色样板”。

关于“样板戏电影”：系指在样板戏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与拍摄的影片，其中除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与钢琴协奏曲《黄河》合拍成一部影片外，其余每出戏皆拍成一部影片。1974 年之后，全国各地曾陆续拍摄了各种版

本的样板戏影片，包括京剧版《红色娘子军》、京剧版《沂蒙颂》(更名为《红云岗》)、 交响音乐版和粤剧版《沙家浜》，维吾尔语版《红灯记》(成荫导演) 等。本文的研究客体以人们惯称的“八部样板戏”中的京剧、舞剧为主，其它影片因暂时不便观摩，且并非以传统叙事形式出现，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注 2：北京电影制片厂《智取威虎山》摄制组《还原舞台 高于舞台——我们是怎样把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搬上银幕的》，见《革命样板戏评论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06 页

注 3：样板戏及样板戏电影以公式化、概念化而闻名，“三突出”是样板戏创作规范的核心，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此外，从“三突出”中还衍生出一套“三字经”理论，如“高起点”、“三陪衬”、“三特定”、“三对头”、“远铺垫”、“近铺垫”、“多层次”、“多波澜”、“多回合”等。样板戏电影在江青的操纵下还特别总结了“四字诀”经验：敌远我近(景别)、敌暗我明(灯光)、敌小我大(造型)、敌俯我仰(镜头)、敌寒我暖(色调) 等，还有我强敌弱，我美敌丑、我胜敌败、我正敌侧等成套“四字诀”。在彩色影片中还特别规定对待敌人要用绿光，对待英雄人物要用红光等教条，以及实现英雄人物“近、大、亮”，反面人物“远、小、黑”的“三字经”

注 4：高小健《中国戏曲电影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 页

注 5：Richardson.D and Robinson.V (ed.) *Introducing Women's Studies*, Macmillan,1993,p50

注 6：远婴《女权主义电影批评》，见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60 页

注 7 : 转引自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5 年版 , 第 3 页

注 8 : [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 : 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 第 156 页

注 9 : [英]帕特里克·富尔赖, 李二仕译《电影理论新发展》,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4 年版 , 第 103 页

注 10 : [美]劳拉·穆尔维、周传基译《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 见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 , 第 570 页

注 11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受虐狂的系统问题》, 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超心理学 : 精神分析的理论》, 1987 年版 , 转引自[英]帕德里克·富尔赖《电影理论新发展》, 李二仕译,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4 年版 , 第 6 页

注 12 : 同注 11

注 13 : 民间故事中的原型大致是这样的 : “河北一个地主借口老婆不能生育 , 奸污了年轻的丫头 , 并说若生了男孩 , 就纳丫头为妾。临盆之日 , 地主摆下催生酒 , 到处张贴‘弄璋之喜’ , 但是降生的却恰恰是个女孩 , 于是地主便迫令丫头脱光衣服带上孩子 , 把她赶出门去。由于地主的威吓 , 亲友们都不敢收留她 , 她只好钻进山里 , 饥寒交迫的她曾想寻死 , 幸因河北山上枣多 , 她吃着枣又活下去了 , 把孩子也养大了。因为不吃盐 , 长了一身白毛。有一年八路军从那里过 , 把她救出。以后她头发变黑了 , 并且结了婚 , 当了某地的福利部长。”见水华、王滨 : 《白毛女》,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 年版 , 第 249-261 页

注 14 : Kristeva, Julia :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 转引自[英]休·索海姆著《激情的疏离—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导论》，艾晓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60 页

注 15：南帆：《问题的挑战》，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28 页

注 16：姚晓蒙、胡克《电影：潜藏着意识形态的神话》，转引自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年版

【蓦然回首】

令人震惊的“一〇·二七”事件

李木森

作者简介：李木森，重庆人，1938 年生。1958 年中专毕业进重庆大型国防企业国营江陵机器厂工作，任助理技术员。文革开始时是共青团员。1966 年底参加造反，先后任军工造反兵团勤务组成员、军工井冈山总部一号勤务员、反到底工总司一号勤务员、反到底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一号勤务员。参与指挥了重庆大武斗。1968 年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197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结束后被清查、撤职，1986 年 2 月被作为“三种人”开除中共党籍。1999 年以高级工程师职称并享受劳模待遇退休。

（1967 年）“九五”命令之后，武斗基本平息。十月里，全国各地贯彻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精神，进一步促进“大联合”。然而，十月下旬，重庆又突然发生了一个震惊一时的血案——“一〇·二七”事件。

这一事件发生在军事院校驻地，又是驻校勤务连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的大案，因此由中央军委直接处理。不过，因为此案与重庆两大派有关，在五十四军

的领导和支持下，重庆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在各种学习班里，反到底六大司令部（注：即反到底派工总司、农总司、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机关司令部、文艺界延安兵团总部）的人员回回挨整，整得我们个个伤心，最令人伤心的是，整了二十余年了，却至今不给我们一个结论。看来，只有自己把亲历的“一〇·二七”事件讲出来，自己给自己作个结论吧。

大约是十月二十五、六号，也就是“一〇·二七”事件发生的前一两天，赵安京（注：时为代号总字 412 部队的解放军重庆通信兵工程学院中层干部，反到底派 412 红旗造反团成员，该组织驻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的代表）向六大司令部讲了一件事情：他们通信兵工程学院的领导干部要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该学院也介入了重庆的文化大革命，也有八一五观点和反到底观点的两派群众组织，而反到底派实力更强，学员和干部中的反到底派都占多数，该学院领导干部要到北京参加学习班，就要谈到重庆的文革问题，但他们对地方文革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因此想请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去讲讲山城两大派文革历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于是，十月二十七日这天一早，反到底六大司令部的李木森、黄廉、胡宾、朱镇坤、段炳森、栗远奎、王以时、刘开科等，在赵安京带领下，按时到了位于歌乐山上林园里的通信兵工程学院——当时对外称总字四一二部队，我们也习惯于称它四一二部队，这里的八一五派叫四一二红色造反团，反到底派叫四一二红旗造反团，两派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却斗得你死我活。后人一定会感到很不理解，但在当时却是到处都能见到的情况。

在学院的大会议室里，已经等候着学院的院长、副院长等领导干部。他们都是即将去北京参加学习班的干部。我们几个群众组织负责人，分别向他们介绍了重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我主要讲了军工井冈山的历史，原来的革联会成员军工造反兵团如何走上了砸革联会的道路，以及山城七、八月武斗的发生、发展过程；黄廉主要讲反到底派受压的情况和五十四军如何支一派压一派；王以时主要讲山城两大派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着重讲了反到底派是不是“反军乱军”，怎样才是真正的拥护解放军……其他几位则对上述三个讲话作了些补充发言。我们足足讲了三个半小时，首长们听得十分专注，也十分兴奋。

下午三点左右，在学院一个大坝子里召开大会，也就是让我们和学员们见见面，讲讲话。通知了全体学员参加，八一五派的学员是不是也来了，我们不清楚。我们几个人都分别讲了话，内容不外乎拥军爱民，向解放军学习，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今后的斗、批、改任务等等。

晚上八点左右，在学院大操场举行文艺演出，由反到底工总司财贸井冈山总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财贸井冈山宣传队，是在原财贸职工业余文工团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在重庆业余文艺宣传队中算是艺术水平最高的，可以说是相当于专业水平。节目虽然都是当时歌颂毛主席、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节目，但艺术性、观赏性还是比一般的要高出许多，因此来看演出的人也很多，不但有本学院的干部、学员（两派的都有），还有附近一所中学的学生和学院周围的农民。又是在大操场上公开演出，人员比较杂乱。

当演出歌颂毛主席的节目时，秩序还好。当演到表现反到底派在“二月镇反”中遭到镇压的情景时，就开始出现骚乱了，场地周围观众中的八一五派人员开始谩骂，起哄，甚至拿石块、砖头扔向演员，有的砖头还砸到了观众席前排学院领导干部和我们几个人坐的地方。这自然引起一些观众的抗议和干涉，

学院勤务连（我们当时也叫警卫连）出动了一些战士来维持秩序，但却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看来八一五派与学院勤务连早有矛盾，吵闹得更加厉害，石块、砖头扔得越来越密集，变成了一阵乱石雨，演员和乐队都有人被砸伤，乐器也有的被砸坏了……场外还有人高喊：“揪出砸派大头头！”

在这种情况下，演出不得不中断，学院首长指示勤务连夹道护送我们几个人到操场旁边他们的营房去暂避。

勤务连营房离操场不远，有一个大门，大门里是一个比篮球场大得多的坝子，穿过坝子，就是一长排平房，平房前有一溜长长的台阶，俗称檐坎，檐坎上站着一些战士，有的手中没有枪，只拿着锄把或木棒——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枪，在武斗期间被学院的八一五派抢去了一半，“九五”命令后，八一五派把武器自己封存起来，并没有归还给他们。

平房被分隔成一个个小房间，每个房间两张双人床。我被安排到较中部的一间小房里，由一个小战士陪着我。

我进屋后不久，就听见外面有广播大喊大叫起来，说勤务连抓了革命群众，

紧急呼吁八一五派的某某组织快到勤务连营救革命战友……我和房间里的小战士议论这个广播，明明是我们几个人被送到营房保护起来，哪里是抓了什么八一五的人呢？分明是他们想冲击营房的借口。一定是想来抓我们几个人。

我和小战士议论了一会儿，大门外就传来了大喊大叫的吵闹声。我们马上得到通知：关上门窗，注意安全。

门窗关上不一会儿，大门外的吵闹声更近了。那位小战士看样子不到二十岁，却显得十分沉着冷静，他把手中的半自动步枪上的刺刀拉出来，面对着门，两手平端半自动步枪，对我说：“请首长放心，只要有我，就有你的安全！”

看来他已做好准备，要和外面冲进来抓我的人拼刺刀。我真佩服这位与我素不相识的小战士。

突然，外面响起一阵射击声，是一二十支枪同时发出的，顿时吵闹声一点都没有了，变得非常安静。

可是，这安静的气氛没有维持两分钟，吵闹声又爆发了，而且比此前闹得更凶了。

接着，又是一阵短促的射击声……

第二次射击声过后，周围完全安静下来了。一点吵闹声都没有了。

过了几分钟，有人在门外通知，叫全体开门出来，撤退上山。

小战士把门打开后，我和他一起走出去，顺着房门外的檐坎，跟着大家一道上山。这时，我看到坝子里的情景真使我感到惊心动魄：平房的檐坎大约比平房前面的坝子高出四十公分。坝子里，倒着好几十人，有的还在地上喊叫着滚动。倒下的人，最前边的，离我们这排平房已经不到四米远了……

勤务连的指战员领着我们从平房一侧上山。我侧身望了望那些倒在地上的 人，一边走一边感叹，他们也真是太亡命了。冲勤务连营房，只差几米就能冲上来抓到我们这几个人了！

事后分析：勤务连的第一阵射击，把冲击者吓着了，停顿、退缩了一下，但是当他们发现只是对空射击，他们没有谁被打着时，就认定勤务连不敢向他们开枪，胆子就更大了，又冲了上来，因此，第二次射击就打倒了他们几十人（注：据记载，此事件中“32 名学院学员及附近群众被枪打死，53 名学员、群众受重伤。”见《重庆市志·第一卷·大事记》，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第一版 412 页）……

我跟着战士们，边走边想，不知怎么我前后的战士都站住不走了，原来是我们这一群人在黑暗中走错路，掉队了，与前边的人失去了联系。

战士们商议着该怎么办，有的说退回去肯定不行，勤务连的枪有一半还在八一五的人手中，回去肯定要遭枪打；有的说干脆把手中的几支枪埋在山上，只保留几根锄把、木棒作自卫武器，翻山下去找兄弟部队……议论纷纷中，有战士提出要我这个“首长”作指示，我虽然也只有二十几岁，但在这群小战士当中算是年纪最大的人，在这样的时候也就不客气了，对他们的议论作了总结性的发言：第一，不能回去，要继续翻山，尽快与山下的七八三六部队联络上；第二，枪是战士的命根子，不能埋在山上，要带下山去。下山后立即与五十四军军部取得联系，听候军部处理。

那些小战士还真听我这个“首长”的“指示”，我们又一起翻山越岭，翻上这座山，又下那座山，有时是走，有时是滚，或者说是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在黑夜里，在没有路的大山里，从这天晚上十点多钟，走到第二天天亮，大约翻遍了整个歌乐山，总算到了二钢的石井坡铁路货场。我们再沿着公路走，到了七八三六部队（五十四军的一个团）。在七八三六部队吃了早饭，电话联系了五十四军军部，军部叫大家休息等待。我们就在这里大睡了一会儿。

上午十点半左右，五十四军派来军用卡车一部、军用吉普车一部，卡车把那些战士送到军部去了，吉普车则把我送回到体委办公楼。

整个事件就是这样，没有什么“阴谋”，没有什么“策划”，只是因为派性而引起的一场不应有的冲突，当时刚刚在贯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中央三令五申，一定要各地坚决执行，坚决照办。勤务连对冲击营房、殴打战士、抢夺武器、劝阻不听者开枪，完全是执行“九五”命令。可是后来却说勤务连犯了罪（注：当时两派小报均刊登了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的五点指示及重庆市革筹组、警备区的决定，其主要精神是，认定此事件为412部队勤务连“在坏人操纵下”开枪杀害革命群众”的“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412部队勤务连被解除武装，集中整顿，连级领导干部被拘留审查，排级干部被隔离审查。文革结束后此案是否有新的处理结论，不得而知）。他们后来到底受到了怎样的处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但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位小战士为保护我而不惜与冲击者拼刺刀的样子。不知他后来的命运如何了。但愿他一生平安！

回到体委办公楼，已经是将近中午十二点了。段炳森等许多人都围着我问长问短，对我昨晚掉队后的那场意外遭遇表示同情和关心。他们几个人都先回来了，他们是跟着勤务连翻过山就在公路上乘上了汽车回来的。

段炳森还叫电话员通知黄廉，下午两点到体委大楼开会。黄廉当时一般不住体委办公楼，而是单独住在背后的重庆市文联院内或其他地方，行踪不定。特别是遇上出了大事的时候，很难找到他。

下午，六大司令部开会研究了“一〇·二七”事件发生后的对策。

这时，我们已经知道八一五派在大造舆论，说这一事件是反到底派的阴谋，是对革命小将的“反革命大屠杀”，我们商定了一些大标语内容，如“坚决支持四一二部队勤务连执行‘九五’命令”、“向解放军开枪射击有罪，解放军自卫还击有理”、“八一五冲击解放军营房罪该万死”等等。我们当时以为勤务连是五十四军派出的，所以还写了“五十四军驻四一二部队勤务连镇反有功”之类标语。六大司令部的两位大秘书还迅速写出了《告全国人民书》，上报党中央，并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到重庆的各区县。

(节选自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一书第五章。全书共12章23万字。)

【书评与序跋】

是文化的革命还是武斗？

——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序

徐友渔

不论是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专门研究者，还是一般想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何蜀著《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书。作者以历史研究者的素养和功力，客观、冷静地叙述了以派性武斗为主要内容的重

庆文革历程，提供了一幅生动、全面、可信的画卷；作者对于文革有亲身经历，能够轻易区分什么是宣传，什么是实质，能够在文革中喧嚣的官方宣传和派别组织宣传中把握运动进程、转折的真实意图和原因；作者虽然身处中国西南，但与许多孤独思考、单兵作战的文革写作者不同，他与国内、海外的同行有密切接触、交流，对于海内外有关文革研究的概况和动向了解甚多，因此避免了一些人难免的闭塞与偏狭，视野开阔、论述中肯。

书名《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准确地揭示了文革的实质，发人深省。文革一开始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和塑造一代共产主义新人相标榜，这不但赢得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的狂热支持，而且使得全世界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浮想联翩，似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现社会公正、平等，把人性改造为绝对纯洁无私的尝试。本书揭示，文革根本与文化无关，武斗是文革逻辑的必然产物；本书还披露，武斗其实完全在文革发动者的预料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本书以翔实材料说明，大规模武斗是在文革发动者的纵容和煽动下酿成和扩大的。

不少人——特别是回忆文革迫害官员和知识分子的人——把文革中的武斗理解和描述为拳脚相向的殴打，对于身受其害的人来说，这是自然的，但这只是文革中武斗的一个方面。大规模的、成建制的，使用枪炮的武斗则是延续时间更长、席卷人数更多、引起伤亡更严重、破坏更大的武斗，这种武斗使厂房、商店、图书馆、实验室夷为平地，使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使冲锋在战场的青年像被收割的稻禾般成片倒地。本书对前一种武斗有所描述，更着力说明和分析的则是后一种武斗。

作者认为，投入血腥武斗的两派誓不两立，但从根本上说并无是非与善恶之分。他们都是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己任，都能从“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中、文革的纲领中得到启示和根据，都能从当权的“中央首长”的指示和讲话中获得鼓舞士气的表态，都能从“无产阶级司令部”信任的某支军队、某个官员那里得到明确的支持。那么，他们到底为谁而战，伤者为谁流血，死者为谁而亡？所有的组织都宣称自己是为毛主席而战，都把本派死者加封为“英勇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烈士”，尽管会有偶然和例外，尽管参与武斗的动因并不单一，尽管人们事后不一定坚持当时的信念，但从根本上说，他们确实是在为毛泽东而

战，这就揭示了悲剧的根源。

文革中，全国各地武斗急剧升级，派性斗争恶性发展，久久不能平息，最重要的原因是军队的介入，军队是群众组织的靠山，他们利用自己的力量和权威支持一派、压制打击一派，在背后出谋划策和指挥，甚至以变相手法发枪给自己的一派。这一切，都是出于毛泽东“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甚至“武装左派”、“发枪给左派”都是出自毛泽东之口。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丧心病狂，但其中自有政治考量和利害计算，读了这部著作，人们才会理解那些原来不可理喻、不可想象的事情。当然，尽管其中的理路和计算是清楚的，但其动机和做法仍然是丧心病狂的。

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极其巨大，但在武斗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因为往往发生在幕后而不易为人所知。重庆的文革历程让我们得到难得的了解、研究这方面情况的机会，因为重庆驻军是“王牌军”之一，他们有恃无恐，行事较少隐晦，他们与一派组织的战友关系在全国是最明显和典型的。作者充分利用了自己身在重庆的有利条件，本书在这方面的说明与分析，将对下一步深入研究文革起到示范作用。

何蜀专心致志、锲而不舍，在打捞历史记忆、还原文革真实方面作出了可观的成绩，我祝愿他不断有新著问世，为他自己，为我们大家，也为下一代。

【书评与序跋】

从《深翻》看老外笔下的农村文革

徐海亮

2006年6月我去香港城市大学参加文革40年的一个研讨会，该会议同时也是韩丁的朋友们在海外的一次纪念他的活动。我听说韩丁多次去过的长治张庄大队的书记王金红也要前来，特地嘱咐会务人员把他和我安排在同一房间。王金红听我说希望知道农村文革的情况，就告诉我，韩丁曾经写过一部小说，叫作《深翻》，就反映了长治农村的文革，我欣喜地问他，有韩丁的原著和文稿吗？书已经出版了吗？他回答说已经印出来，邀请我回去后到他家里去看。

王书记的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收藏库，他给我展示了他收藏的历史文献、

文革传单印刷品、会议证件、表彰证书、农具和模型、自制的工艺品、各种照片邮票，还有韩丁亲笔题字的英文版《深翻》，以及翻译初稿的复印件。我第一次看见这部大书，问王已经出版中文了吗？他告知实情，并希望能够出版。尽管我很想立即通读这书，但也不好贸然带走王金红的珍藏。我像发现了重大的地下宝藏一样，兴冲冲回到北京。它告诉我，就在我们许多人辛勤地发掘资料、采访当事人和撰写文革口述历史之前好多年，美国友人韩丁已经在海外出版了这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巨著。韩丁的朋友商老师（Msachi Sandra）在北外任职，她那里也有复印的中文初稿，并慷慨地借给我；韩丁的妹妹寒春 85 岁了，住在昌平沙河，她家里藏有英文原著，也借给了我。

我开始读《深翻》、还读了王书记主持编印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韩丁》画册，我慢慢明白，有一位我们至今尚不认识的，生活到了 21 世纪的“白求恩同志”，有一位我们至今并不知晓的外籍的文革研究家……

韩丁的《深翻》，一开始就交代了时间地点背景，是在 1971 年的山西长治农村的“批陈整风”运动中。说实话，当时参加整党运动的基层干部，并不知道这个运动的最上层是在批判中央第四号领导人陈伯达，当然更不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长治当时的运动，是在批判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从书的第一到第六部分，作者回顾了文革前的历史：合作化、大跃进、反右倾、四清运动，这些回顾与交代是必须的，因为韩丁重返张庄，他要采访和记录他 1948 年离开后，这个村庄的所有变化，这也是周恩来请他回来的初衷；况且，我们清楚：不明白我们的农村和城市的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全过程，就不能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文革。

到第六部分末尾，韩丁已经把我们带进了长治农村的文革。第七、八、九部分，是“林彪事件”以前的张庄和长治，乃至山西的文革过程。有意思的是，韩丁几乎是用一个小小的基层的典型，用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实际生活、话语、心态，描绘了一幅浩繁、漫长的历史画卷。这几部分，我以为是该书最传神的部分，它们牵动和触及了革命战争、土改到文革的全部历史，浓缩了一个地区和村庄的历史文化积淀，集中地表达了作者对于农村社会主义历史的看法，更集中地记录了一个村庄的文革。如果这本书出版不了，我想，甚至可以用“一个外国友人笔下的农村文革”为题，来独立地将这后面几部分在网络上公诸国人。

近 20 多年来,特别近 10 多年来,海内外已经有了好些研究文革历史的新作,文革研究开始走出 *ABC* 文革、概念化文革和简论的初级阶段,出现一些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的科学方法,对于真实的历史过程、人物、地区、部门、事件做典型分析的成果。而且还有许多民间的未定稿——由于大家共知的原因,许多精彩的研究和个人回忆录书稿,仅能在研究者或某些特定群体中传递。我已经读过的有专门涉及文化领域、政治领域、军队、工厂工人、造反派的作品,但还没有读过讲农民和农村文革的书;《深翻》是我读的第一本一个村庄“继续革命”历史纪实的巨著。我想,《深翻》中、英文版的出版,为我们的国史、文革史研究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

尽管张庄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它坐落在抗战时八路军根据地和日伪势力犬牙交错的地区,就在解放战争第一仗“上党战役”和土地改革发动的一个关键——晋东南长治城郊。它处在中国农业合作化兴起的晋东南地区,张庄农民认真地被卷入和参加了农村的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几乎中国发生了什么,张庄人就议论过什么!除张庄之外,韩丁的《深翻》里还介绍了一系列农业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山西先进典型,我们从张庄,也想到了他们全体。张庄处于城乡结合部,工业化的进程,使张庄的农民优先受到时代的洗礼,长北火车站就在庄外,一些国营和兵工大厂,也征用了张庄的土地。长治飞机场离这里不算太远。颇有历史的老校潞安中学,也在张庄。这里还有华北最大的天主教教区,教堂也在村里。由于张庄的区域政治文化渊源和地理区位优势,文革的大潮流必然席卷这个并不偏僻的乡村,工人和学生的文革运动深刻地影响张庄运动。长治地区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某一大派的武斗总指挥部和基地,就在张庄附近。后来部队被派过来制止武斗恢复秩序,指挥部也设在离张庄不远的飞机场……因此,你要张庄农民不积极参加文革运动,你要王金红书记不热衷收藏文革和其他文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和工业化的村庄。

我觉得从文革研究的意义上看,张庄的特殊典型性超过了我现在知道的其他所有村庄。

文革运动中,我并没有去农村地区串联,后来搞教育革命调查,也只是去到专县以下做“专业和教育”问题的徒步考察与调研,没有涉及过农村的文革运动。当年陈永贵向中央建议开展农村运动要保持农村的稳定、保证农业生产,我们读

了中央批转的陈信，都很赞成，有的同学还提议说，文化革命运动，对于县团级以下的干部应该是正面教育，不要铺得太开。1968 年开春后，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中学师生和省直干部下乡，帮助农村生产大队一一建立春耕临时的领导班子（湖北当时大队一级多处于瘫痪状态）。那时我才对当时的农村造反夺权情况和原来基层干部的心态，略有所知。1970 年春，我从部队锻炼出来，被分配到河南与安徽交界的沈邱县，和该县的工作队一起进驻全县的整党重点大队，与县、社、队干部一起参加了整整两年的“一打三反”、“整党建党”和“农业学大寨”、“批林整风”运动。我们工作队的国家干部，多是当时说“站错队”的“保守派”，为怕被人指责为“右”，他们说的和做的可能比年轻的红卫兵还要左倾和幼稚！我和一个生产队长睡在一个大床上，也接触了大量的农村新生积极分子、造反派头头，我白天下地生产，搞土地平整、田间水利配套、种植水稻；晚上开会，批斗农村“走资派”——原来的大队书记。批斗地富分子，学习“九大”党章，发展党、团员。除了没有发生激烈的派性冲突外，韩丁在《深翻》里写的大活动，沈邱都有相似之处。读张庄的文革运动记录，使我有特别的亲近感，我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在沈邱参加的那些活动，从新的角度，悟到了好些当年参加文革没有悟到的东西。

我在武汉以大学生身份参加文革，比较熟悉的是发生在大型工业和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毕业后到河南生活、工作了 24 年，才感觉到河南的文革基本上反映的是农村的社会和政治文化问题，才开始体验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底层、共和国历史对于文革的根本影响。我这时才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河南的学生和市民造反运动基本上还是一次农民造反运动。而这些根本性的东西，在韩丁的书中都有极其深刻的反映。可以说，读者会从《深翻》里读出在我们这个悠久的农业文化国度中，文革发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我非常佩服韩丁，他异常了解和理解中国农民，全方位地介绍了典型村庄的社会历史、民俗风情、宗教文化等等，忠实地记录下张庄农民的语言、心态。从文革时期张庄农民妙趣横生的时代性话语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上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看到了那个时代我们的农村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在想什么做什么，尽管如韩丁书里所说，当事人后来谈起文革中的纠纷冲突，也忍不住笑起来，但我希望后人真正弄明白，为什么那一代崇尚理想主义的青年会如此去追求与奉献，会

发生今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书里通过文革时期的生活、文化，透露了大量农村社会、风情、民俗、传统的信息。可以说是一个村庄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我不知道中国的学者们会如何看这本书，是把它看成学术著作？还是将其视为烦琐无味的乡土纪实？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文革研究者、社会研究者，可能会在美国人韩丁的这本书前汗颜，我们本来应该像他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深入普通民众的生活，深掘具体的文革学与泛义的社会学题材，而不是脱离社会实际去高谈阔论一些抽象概念。和鲁德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一样，韩丁的书也可以看做“文化革命中的山西农民群众”。

过去一个阶段的文革研究，人们主要的兴趣和对象在于上层的人物和政治斗争。我觉得韩丁的研究与传统的中国史学方法不同的是，他特别关注底层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文化，以及他们在文革中的追索和斗争。这是类似心态史学那样的精神产品。当今存在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以为仅仅是某些领袖人物造就了这个运动，造就了历史悲剧。其实，文革是一场空前浩大的群众政治运动，如果没有浸浴着特定传统文化的亿万群众和干部——包括我们这些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文革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倾情投入，文革也不会成为那样的文革。韩丁在《深翻》里评议了——乃至批评了中央的高层领导的主观设想和客观结果，同时也让我们冷静地看到了我们每个人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或许我们今后可以越来越多地读到中国人写的基层文革斗争的优秀作品，但我们不会忘记韩丁《深翻》的非凡贡献。

韩丁并不是以一部《深翻》来跻身于文革学界的。他 1971 年来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最先去了二七车辆厂和清华大学，考察了那里的文革运动和斗批改活动。他最先写的有关文革的记述，不是 1983 年出版的《深翻》，而是 1972 年出版的《Hundred Day War》（《百日武斗》），副题是“清华大学的文革”。出版方为美国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创办的《每月评论》。

值得一提的是，韩丁也从他的典型研究里，得出对于宏观文革的认识。在书里，他深有感触的是派性和农村宗派纠葛扭曲了这个村庄的“继续革命”，他看到了军队介入运动的负面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把运动看成是所谓“拥军”和“反军”的矛盾），他更看到了山西、全国的党内斗争。住在张庄大队，他看到了长治，看到了山西，而且想到了全国。他在 1971 年的来访，与周恩来和其他高层

官员接触，开始有了基本的、客观的印象与认识。1980年前后他写作《深翻》，正值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对运动有了新的判断，韩丁一方面与中共中央保持认识的一致，一方面也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继续探讨中国革命的历史道路和存在的问题。这些，可以在他之后的论文、专著中看到。

韩丁毕竟不是在专门从事文革和历史学的研究，写作《深翻》时所依据的资料和资讯也是不完整的，他在这本纪实文学作品和其他论著里对文革的印象和所作的探讨，并非对张庄或长治——乃至中国文革运动的一种最后结论或者裁判，我们也不苛求与指望任何个人来对这么浩大的、亿万群众参与的历史急忙地做一个“全面的、最后的”，“最深刻的”结论。但是，这位白求恩式的老外，对中国革命的历程和中国的文化，是真心诚意热爱的，他实事求是、客观地，几近白描地记录了他看到听到的文革片段，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求之不得的宝贵史料。在唯心史观盛行，一些风头出尽的“学者”可以任意“创造”和曲解历史的今天，“老农夫”韩丁留下的这些文字，弥足珍贵。

【简讯】

《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公开出版

余汝信

由丁盛口述、金光访问记录、余汝信整理编注的《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近日在香港公开出版。

本书根据丁盛生前1990年代中期的两次谈话录音整理而成。谈话录音经金光转换成文字稿，曾于2001年自行印刷，在战友中内部传阅。受丁盛将军亲属的委托，编者近一年来对自印本进行了史实和文字上的订正，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记录将军一生征程的珍贵历史照片及生平大事年表等附录文字。广州军区老同志、原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迟泽厚老人，为本书写了情深意切的《一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同志晚年》一文，并对全书整理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校阅。

丁盛文革期间曾先后担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重新整理后的回忆录共分为十四章，其

中涉及文革部分四章，分别是第十一章新疆岁月、第十一章军区司令（一）、第十二章军区司令（二）和第十三章飞来横祸。这些质朴的文字，揭露了文革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内情，反映了一位为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的高级将领在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困惑与磨难。

【简讯】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简介

唐少杰

2006 年 8 月，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四十周年之际，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的波尔纳普出版社（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发行了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先生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先生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此书的问世成为世界范围的文革研究领域及其相关学者所瞩目关注的一件事。此书涵盖了文革历史的整个过程，囊括了文革的各个阶段，具体地凸显出毛泽东对文革的独特作用这一条主线。此书不仅仅限于文革的达官显贵或风云人物，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平民百姓的文革生活，以鲜活的话语和真实的记述从不同的视角映现出文革奇异多样的风貌。此书填补了文革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几个空白，最主要的就是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和“清查五·一六”的揭露和概述。麦克法夸尔教授（中文名字“马若德”）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沈迈克教授现执教于瑞典隆德大学东亚系，他们二位是现今世界上最著名的文革研究专家，有多部重要的文革研究专著、文章问世，他们的著作代表了欧美研究文革的学术界的现状、实力、水平和特征。此著问世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他们在该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谨以此书献给数不清的中国人，他们有关文革的著作和言论启发了我们。

也谨以此书献给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或许能更自由地研究和著述这些年代发生的事件。

兹将此书的目录标列如次，以飨文革故乡的广大研究者，并望学界同仁对其问世予以高度的关注。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目录

序言

缩写词

导论

①毛的思想演变；②毛为修正主义困扰；③国内的困局；④赫鲁晓夫的下台；
⑤“九评”之九；⑥乌云压城

1、第一轮排炮

①走马换将开始；②清洗总参谋长；③《二月提纲》

2、围攻北京市委

①匿名信事件；②窃听器事件；③拆除“定时炸弹”；④起诉书；⑤输家；⑥
赢家；⑦反应；⑧“紧跟”主席；⑨保卫首都

3、校园大乱

①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②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③收拾残局；④工作
组

4、五十天

①大字报；②抵制工作组；③毛的情报渠道；④毛回北京

5、毛的新接班人

①造反有理；②毛的炮打司令部；③十六条；④新的领导层；⑤中央文革小
组

6、红卫兵

①教育革命；②接见红卫兵；③革命的游山玩水；④破“四旧”

7、红色恐怖

①打、砸、抢；②遣返或屈辱；③红卫兵的竞技场

8、天下大乱

①中央工作会议；②文革蔓延到农村和工厂；③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

9、上海“一月风暴”

①中央文革小组登上舞台；②向中央政府开刀；③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

④上海工人造反；⑤上海的“一月风暴”

10、夺权

①第一批革命委员会；②恢复秩序；③解放军的作用；④“三支两军”

11、老师们的最后抗争

①陶铸一案；②二月逆流；③毛的反击；④联合行动委员会

12、武汉事件

①华中告急；②百万雄师；③毛重返武汉；④武汉事件；⑤“武装左派”；⑥
连锁反应

13、五·一六阴谋

①国际层面；②火烧英国代办处；③左派癫狂；④王力的倒台；⑤军队层面；
⑥王乃英案；⑦保护周恩来

14、红卫兵的消亡

①革命委员会；②和平过渡：天津；③暴力过渡：广西；④革命委员会的组成；
⑤清洗杨成武；⑥红卫兵的消亡

15、清理阶级队伍

①对毛的个人崇拜；②对经济的影响

16、为刘少奇定案

①致命打击；②新党章；③对他人的定案；④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17、胜利者的大会

①筹备工作；②林彪的报告；③新党章；④新中央；⑤党的机构；⑥革命队伍的分裂；⑦“一打三反”运动

18、战争的威胁

①珍宝岛事件；②另类班子的报告；③国防措施；④林彪的第一个号令；
⑤对美国开放

19、林彪的叛逃和死亡

①国家主席问题；②庐山风云；③甩石头……；④林彪政变？

20、毛泽东稳住阵脚

①笼络老帅们；②复查干部；③悲惨的狱中生活；④周恩来的作用；
⑤国际关系；⑥解冻；⑦左就是右；⑧接班

21、周恩来承受压力

①邓小平复出；②党的“十大”；③裂痕表露；④批林批孔；⑤回眸基层

22、邓小平主政

①推动中国发展；②整顿解放军；③整顿教育；④“经验主义”和派性之争

23、“四人帮”的出现

①邓的智囊团和决策；②“评《水浒》，批宋江”；③反复；④反击右倾翻案风

24、1976 年天安门事件

①周恩来去世；②批邓运动；③群众觉悟了；④天安门事件

25、毛主席的最后日子

①启用华国锋；②倒计时；③应急之策；④毛泽东去世；⑤“粉碎‘四人帮’”

结语

① 华国锋的失势；②掘墓：平反昭雪；③驱邪：审判“四人帮”；

④解释：关于中共党史的《历史决议》；⑤分水岭；⑥政治僵滞

人名表/关于征引材料的说明/注释/参考文献/图片来源/索引

【简讯】

重庆文革墓群近 30 年简况

樵 余

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公园一个荒僻角落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由当年的群众组织和死者家属自发修建于 1967 年夏至 1969 年初，共有大小墓茔 130 多座，埋葬着当时的八一五派成员及部分平民和个别反到底派成员的遗体约 400 具。是全国至今唯一保存较为完好的文革墓群。

1979 年 4 月，青年诗人顾城随其父顾工到重庆嘉陵江畔采风，顾城写成《歌乐山组诗》，其中《红卫兵之墓》和《永别了，墓地》均抒写重庆文革墓群引发的感慨。11 月在《诗刊》发表。

1980 年代中后期，一度有人要求平毁这处墓群以“清除文革遗迹”，但反对者则要求保留墓群以警示后人。时任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亲临墓群视察后，为平息争论，决定既不拆也不让人参观，由市里拨款让公园修一道围墙把墓群隔离保护起来。

1989 年，四川电视台摄制的文革题材电视剧《无人知晓的世界纪录》中采用了重庆文革墓群的镜头。

1990 年代，《重庆晚报》、《天津青年报》等对重庆文革墓群及相关历史背景有过报道。

1995 年初，重庆《红岩春秋》杂志第一期发表重庆电视台编剧张鲁《红卫

兵武斗忏悔录》，联系重庆文革墓群将在城市开发中遭到平毁的传闻，对安葬于该墓群中的八位同学在武斗中的不幸身亡作了追忆并对武斗进行了沉痛的反思。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1995 年 8 月号发表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1996 年收入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文第一次对重庆文革墓群进行了学术性的考察研究，公布了作者的一些实地调查数据，特别可贵的是作者在调查中抄录的一些墓碑文字资料几年后已经风化损毁不复再见。美中不足的是此文将这处墓群定名为“红卫兵墓地”，实际上（作者文中公布的调查结果也说明）墓群中安葬的人员身份大多不是学生（红卫兵），而是工人或其他市民，其中几座埋葬 15 人以上的大墓中的死者主要是国防工厂、钢厂或财贸系统职工。

1996 年，香港无线电台编辑许慕贞到大陆摄制文革 30 周年系列节目，其中一集拍摄了重庆文革墓群。

1999 年 12 月 4 日，《重庆晚报》发表《文革墓群：一个尴尬的话题》。

2001 年 4 月 19 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余刘文与重庆文革亲历者韩平藻合写的《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遭到中宣部查究。但此文迅速在网上流传（直到 2008 年 8 月还被北京《文学故事报》摘要转载）。

2003 年开始，北京独立制片人刘伟多次来到重庆，与韩平藻合作，以重庆文革墓群为题材摄制学术性专题纪录片（至 2006 年因故停机）。

2003 年 5 月 6 日海外出版的网络杂志《文革博物馆通讯》176 期（华夏文摘增刊 339 期）发表周孜仁为重庆文革墓群所写的《我祈祷，为这段历史的亡灵》。

2005 年，陈晓文撰写的《文革词典》“重庆红卫兵墓”词条先后在凯迪社区、天涯社区等网站贴出，并在美国中文在线论坛、维基百科等多个网站转贴。《重庆红卫兵墓园一览表》5 月 4 日在凯迪社区贴出，由华夏知青论坛等网站转贴。2006 年 2 月 6 日被封。

2005 年 9 月 10 日至 15 日，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陈晓楠和制片人朱为民率摄制组来重庆，与韩平藻合作摄制以文革墓群为题材的专题片，该片完成后为三集共 96 分钟。可惜因触及人为划定的“宣传禁区”，尽管长期申报为重要选题，但始终未能获准播出。

12 月 21 日重庆《时代信报》朱彦报道《探访全国唯一红卫兵墓群：据称将

因开发被拆除》。

2005 年底，重庆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曾钟开始花费大量时间对墓群中的墓主及有关武斗情况向前来墓地祭扫和凭吊的人们进行采访调查。

2006 年 1 月 18 日，《南风窗》发表尹鸿伟报道《探访重庆“文革”墓群》。

2 月 8 日出版的《文革博物馆通讯》315 期（华夏文摘增刊 481 期）发表悲歌寄自美国的诗《历史的见证——有感于全国仅存的重庆红卫兵墓园将被拆除》。

香港《凤凰周刊》2006 年第 2 期（总第 207 期）发表刘志明《重庆红卫兵墓群拆迁风波》。通过对沙坪公园负责人的采访，对近来再度出现的墓群将被拆毁的传闻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并告知：现在重庆市与沙坪坝区很多部门都表示要保留这处墓群，保留这段历史。

4 月 10 日《纽约时报》发表对重庆文革墓群清明节扫墓情况的现场采访报道《清明扫墓 回顾文革血腥年代》。

5 月 2 日，《亚洲周刊》发表江迅、郭宗宪《重庆文革墓见证荒谬岁月》。

5 月，路透社记者储百金到重庆文革墓群采访。

6 月，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古凯蕊到重庆文革墓群采访。

2006 年 9 月，日本 NHK 到重庆等地采访文革武斗情况并拍摄了文革墓群镜头。制作为 4 小时的综合节目，于年底在日本播出。

2007 年 2 月，《华盛顿邮报》记者潘公凯到重庆文革墓群采访。

北京《炎黄春秋》第 3 期发表庞国义《重庆武斗与文革墓群》。

3 月 6 日，陈晓文收集的《重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园碑文辑录》在凯迪社区网站贴出，2008 年 4 月 7 日被封。

4 月清明节时，中央电视台摄制人员到重庆文革墓群拍摄资料。

法国第五电视台摄制组清明节时报道了重庆文革墓群。

四川美术学院李一凡清明节期间到重庆文革墓群摄制专题纪录片。

8、9 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中国籍教授张跃宏到重庆文革墓群展开学术调查采访。

2007 年底，作家徐星独立摄制完成电视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其中有反映重庆文革墓群的段落，由墓主亲属席庆生、席庆川兄弟讲述安葬于此的母亲怎样在武斗中当着他们的面被无辜射杀的惨痛经历。

2008 年清明节前，新加坡《联合早报》就重庆文革墓群情况进行采访。

4 月 2 日公园张贴保护墓园《公告》。

旅美中国学者张跃宏再次到重庆对文革墓群进行调查采访。其间，他鉴于墓群的风化损毁现状修书沙坪公园、沙坪坝区文物管理所、重庆市文物局，建言推动墓地保护及文物申报工作。

2008 年 5 月 1 日北京出版的《先锋国家历史》5 月上旬刊（总第 129 期）发表黄艾禾采访有关重庆文革武斗及文革墓群情况的报道《重庆，火炉在燃烧》。

6 月 2 日（原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40 周年），原四川省、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的重庆文革两大派群众组织部分代表 29 人在沙坪公园见面，聚会后部分人员到文革墓群凭吊。

多年来，此处墓群一直处于无人管理、守护的状态。只是每年春节、清明等节假日由祭扫者略作打扫、修整。一些墓碑风化、损毁严重，近年并有加剧之势。从 2007 年开始，重庆沙坪公园退休职工王友群、职工秦本志、重庆作家李中华等受园方委托介入墓地调查工作。同时，因考虑到有的墓基上长出的树木已经把墓基撑裂，为加强保护，公园对墓地里的杂树进行了清理砍伐，但因缺乏统一规划和专业指导，使一些本应保留的树木也被砍伐，墓地原有的苍凉感遭到破坏。2008 年夏，又发现有人在墓地内一些墓碑上用油漆乱涂乱画，为保护文物不再遭到破坏，公园将隔离墓群的围墙大门关闭并派人值守（祭扫、凭吊者只要告知公园方面即可开门进入）。但墓群中一些地方的杂树杂草又开始疯长，对墓群的保护形成新的威胁。

2008 年 6 月，以沙坪公园为主开始申报文革墓群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预计 2009 年初（一季度）完成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报批手续，随后转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核准工作，再向北京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估计此项工作将延续数年之久，是否能申报成功尚难预知。

【故纸堆】

杂技艺术的新生面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戏剧口批判组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在庆祝建国十八周年举国欢腾的日子里，中国杂技团排演的《革命杂技》，以崭新的姿态同首都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见面了！

这场革命杂技之所以新，就新在它是革命的。它以广大工农兵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杂技艺术形式，表现了革命战斗的内容。整个演出以革命的豪情和战斗的风格，一扫旧杂技舞台上宣扬封、资、修的“耍”、“变”、“练”和所谓“纯技术”的表演，工农兵和红卫兵小将成了杂技舞台的主人。这是杂技艺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进行斗批改的初步战果，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又一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杂技艺术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杂技艺术能不能反映现实斗争？这是杂技界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中国杂技团这场革命杂技的创作和演出，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杂技艺术技术性强不能反映现实斗争的谬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之流，以及他们的总后台中国的赫鲁晓夫，一贯叫嚷什么“看了戏，能得到休息，使人高兴，就很好。”什么“搞娱乐，休息，就鼓励了社会主义积极性了。”杂技界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胡说什么：“杂技的目的就是供人欣赏，使人愉快。”“内容无害，能起娱乐作用，就是有益的东西，对杂技来说这是重要的方面，甚至是主要的方面。”他们极力阻止杂技革命化，甚至声嘶力竭地叫嚷：杂技革命化就会失去杂技的特点，搞革命化的节目是“忘记了杂技的祖宗”，等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把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送进了坟墓，他们的阴谋彻底破产了。这次革命杂技的创作和演出证明：杂技完全能够反映我们壮丽多彩的战斗生活，而且在艺术形式上还能够发展杂技的特点，使杂技艺术也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从这次演出的十几个节目来看，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能够密切配合当前的斗争形势。《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这个综合性的节目，是在气势磅礴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的。旭日东升，用花盘组成的朵朵葵花朝着红太阳，象征着千万颗红心向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抒发了亿万革命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接着，演员们运用不同的杂技形式，把京剧《红灯记》、交响音乐《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八个样板戏，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

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江青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亲手培植的革命文艺样板。《红画笔》以大批判为主题，运用砌砖及晃梯踢碗的技术，描绘了七亿人民都做批判家，大搞批判栏的生动情景。

这次演出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表现了毛主席人民战争的伟大军事思想。例如表现地道战演习的《全民皆兵》，表现游击队员夜袭日寇碉堡、武器库，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的《敌后武工队》，以及歌颂南越解放军智勇双全的英雄形象，揭露美帝纸老虎的丑恶嘴脸的《活捉美帝野心狼》等等节目，都从不同的角度，应用不同的杂技技巧和多种多样的表演形式，形象地、生动地表现了人民战争百战百胜的巨大威力，热情地歌颂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这场节目的第三个特点是，革命的政治内容与杂技的艺术形式得到了较好的统一。从这次演出的节目来看，杂技的基本功和许多单项技巧不是用不上而是不够用了。可以说新的内容对杂技的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敌后武工队》这个节目所运用的翻腾、格斗的动作，在旧的杂技舞台上主要是看演员练功夫，一个斤斗没有翻好，可以重复再练一次，甚至三五次，可是在《敌后武工队》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当武工队员与日寇进行英勇战斗时，这个斤斗就只能一次翻好，不然就破坏了整个主题，破坏了武工队员的英雄形象。又如《全民皆兵》这个节目，基本上是用钻地圈、格斗、翻腾等技巧，但是要充分表现广大革命群众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备战的伟大号召，实行全民皆兵的主题，就必须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打破单项技巧表演的旧框框，结合其他技巧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这说明只靠现有的杂技技巧来反映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生活，是非常不够的。当然，要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杂技，更重要的是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从革命的实践加以提炼，并向兄弟艺术借鉴，从而创造和丰富杂技的表现手段。

这次中国杂技团的演出，尽管节目还比较粗糙，品种还不够丰富，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解决，但是，它在杂技艺术革命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方向是对头的。希望中国杂技团的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认真地进行斗、批、改，进一步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杂技界的流毒，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为创作更多更好的革命杂技节目而奋斗！

(原载 1967 年 11 月 3 日《人民日报》)

【小资料】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8 年 3 月 23 日成立)

主任：许世友，63 岁，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副主任——

吴大胜，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省军管会副主任

杨广立，50 岁，六十军政委

王珽，二十七军副军长

彭冲，53 岁，福建漳州人，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城市贫民出身

常委——

钟发生，54 岁，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

杨新亚，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

赵洪，南京军区军事法院副院长

方敏，六十军政治部主任

黄以干，52 岁，江苏沭阳人，原省农林厅厅长，贫农出身

朱辉，57 岁，江西上饶人，原省委监委书记，贫农出身

周泽，45 岁，江苏泰兴人，原省委副秘书长，手工业者出身

迟明堂，45 岁，山东人，原省贫协副主任，贫农出身

姜启彤，53 岁，江苏宝应人，原省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破落地主出身

李芸华，53 岁，河北安平人，原苏州专区副书记兼专员，富农出身

陈烈，50 岁，山东黄县人，原六合专区副书记兼专员，中农出身

曾邦元，27 岁，江苏太兴人，南京大学助教，贫农出身，中共党员，南大“八二七”（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连会）负责人，“屁派”

文凤来，39 岁，辽宁海城人，南京大学教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南大红四联负责人，“好派”

顾阿桃，女，54岁，江苏太仓人，江苏太仓县洪泾大队社员，中共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曹莲凤，女，22岁，江苏海安人，农民，海安县角斜民兵政治教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章瑞英，女，34岁，江苏无锡人，无锡国棉四厂工会主席，工人出身，中共党员，劳动模范

吕志光，33岁，浙江新昌人，511厂工人，城市贫民出身，“促联”负责人

朱开地，29岁，江西兴国人，晨光厂工人，贫农出身，共青团员，“新工总”负责人，“好派”

唐省智，37岁，江苏淮阴人，南京化肥厂宣传干事，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新工总”负责人，“好派”

陈克兴，25岁，江苏武进人，长江机械厂实习教员，贫农出身，共青团员，“老工总”负责人，“屁派”

薛德元，32岁，江苏高邮人，南京跃进钢铁厂工人，城市贫民出身，共青团员，南京“八二七”负责人，“屁派”

周锡禄，30岁，江苏南京人，省人事局科员，贫农出身，转业军人，中共党员，省“大联总”（江苏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部）负责人，“屁派”

徐松林，36岁，浙江吴兴人，共青团江苏省委干事，城市贫民出身，中共党员，“省革总”（江苏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好派”

注：江苏省及南京地区群众组织因对1967年1月26日夺权持“好得很”和“好个屁”的不同观点而分裂为“好派”和“屁派”，“好派”主要是“江苏红总”、“新工总”等，“屁派”主要是“老工总”、“东方红”、“八二七”等；后来又分化出以促进“好派”、“屁派”大联合为号召的第三派“促联”，实际倾向“好派”。

【小资料】

程明远、刘秀山简介

按：最近在互联网上连载的原安徽省八二七派主要代表梁守福（梁守富）的回忆录《乱流浮沉半生缘》中，又提到了在安徽省文革前期成为安徽两派造反派争论焦点的程明远和刘秀山这两位干部，这两位干部，文革中曾在1967年9月5日的中央首长“九五”讲话中被多次点名批判，当时“九五”讲话曾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要求全国军民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因此程明远、刘秀山之名广为人们所知，但对二人的情况一般人却知之甚少。现本刊综合目前所见到的有关资料简介如下，并望知情者给予更为详细的补充和修订。

程明远

1900年生，安徽肥西县聚星乡人，贫农出身。原名程道富，化名程道福。192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安徽省工作。文革开始时为安徽省林业厅厅长。文革中支持以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淮南红卫军”。1967年1月下旬安徽主要造反派八二七兵团总指挥部在得知中央明确反对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单独成立组织的态度后，提议安徽省军区发出对程明远的通缉令以瓦解淮南红卫军。1月26日安徽八二七派在省军区支持下向省委、省人委夺权后，程明远站到了否定“一·二六”夺权（即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的“屁派”又称P派）一边。1967年3月15日安徽造反派两派发生流血冲突，16日康生、王力、关锋等紧急接见安徽两派代表，对“三一五”事件作了严厉批评。17日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建议》，在第二点中称：“取消对程明远的通缉令，有错误、有罪恶可以到中央控告。不能擅自向程明远发通缉令，过去通缉令无效，取消，希望程明远以及晓得程明远在什么地方的人，马上通知到，参加我们的会议。”程随即参加了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会议。3月25日周恩来等接见安徽代表，八二七总指挥部代表梁守福做检讨时，程当面斥责其被李葆华收买了。27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发出《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即安徽九条），第七条称：“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个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个组织。逮捕于得水

同志、通缉程明远等同志，是错误的。”此后程与刘秀山成为安徽两派争论焦点。P派（屁派）认定二人是革命领导干部，G派（好派，即八二七派）则要打倒。1967年6月安徽八二七派调查公布了程历史上的所谓“变节自首”材料。9月5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全体赴京代表时，江青讲话中说：“还有个什么程什么的叛徒？（姚文元插话：程明远是叛徒。）程明远，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康生讲话中又说：“你们两派头头后面都有坏人，刚才江青同志讲你们P派后头有刘秀山、程明远等人……”康生又说：“有的同志参加了三月会议，在宣布九条后，程明远就没有表态。合肥的代表还记得吗？我记得，当时都表了态，程明远没有表态。我很注意这个问题。……关于他那个组织的问题，就是九条上讲的，‘红卫军’组织的成员还是要回到工厂农村去搞文化大革命，这一点很明显，程明远不满意。”11月1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代表，周恩来谈到运动发展到现在已不能让刘邓陶有发言权时说：“难道让他们有发言权？让他们来保护刘秀山、程明远？”1969年夏程在被作为“叛徒”、“黑手”关押、批斗中去世。

刘秀山

1912年生。抗日战争初期即投身中共事业的“三八”式干部。长期在安徽省工作。文革前曾因在治淮问题上与当时省委领导发生矛盾，于1955年蒙冤下狱，在狱中著有反映新四军一支游击队战斗历程的长篇小说《在大别山上》。1962年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经刘少奇指明“刘秀山是坚持真理的好干部”，得以平反。1963年7月任中共安徽省委候补委员。文革开始时为安徽省文联副主席。文革初大揪“三家村”黑帮高潮中，1966年7月7日被省委书记李葆华点名批判。7月14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和《安徽日报》总编辑黎洪，省文联副主席刘秀山、陈登科，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那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起了大批判。因刘的内侄马某是合肥工业大学采矿系学生，8月26日合肥工业大学学生给省委写炮轰大字报后，李葆华在紧急会议上给大字报定调子就说“是刘秀山一手策划的”。《安徽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合肥一连几天召开声势浩大的“声讨”刘秀山大会。省委还电话通知地、市、县也要召开“声讨”刘秀山大会。1967年1月26日安徽八二七派在省军区支持下向省委、省人委夺权后，

刘站到了否定“一·二六”夺权（即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的屁派又称P派）一边。3月中央处理安徽问题后刘与程明远成为安徽两派争论焦点。P派（屁派）认定二人是革命领导干部，要结合，G派（好派，即八二七派）则要打倒。9月5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全体赴京代表时，江青讲话中说：“现在连刘秀山那样的坏人……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同志们，这个刘秀山是坏人，我很早就知道了，不是现在知道的。只是没有戳穿，我有材料。他是个坏人，他在背后操纵，可能有些好的人上当。……刘秀山躲在北京很久，一直藏在北京，现在不知到哪儿去了？（G派代表：现在合肥，继续挑动武斗。）”康生讲话中又说：“你们两派头头后面都有坏人，刚才江青同志讲你们P派后头有刘秀山、程明远等人，你们好派后头有什么人？梁守富，曹在凤，实际上梁守富、曹在凤后头是彭宗珠，后头是谁？啊呀，安徽问题是错综复杂得很。”9月28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代表团时，张春桥讲话中说：“安徽就是刘秀山那几个坏人嘛，把黑手一揪，问题就解决了。”11月1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代表时，江青讲话中说到有人攻击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还有资格点刘秀山、程明远的名。”说：“我觉得这很奇怪，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是一个革命者，我为什么不可以点刘秀山，反革命刘秀山！在座的小将们，有的还不是共产党员呢，但是他就有这样的英雄的胆量，打倒刘邓陶，打倒李葆华，为什么不能打倒刘秀山？刘秀山是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周恩来谈到运动发展到现在已不能让刘邓陶有发言权时也说：“难道让他们有发言权？让他们来保护刘秀山、程明远？”此时刘已被捕入狱。1970年屈死狱中，终年仅58岁。文革结束后平反。

【编读往来】

一、本刊第一期间世以来，收到了杜光、阎长贵、胡甫臣、王大鹏、黄文华、唐少杰、印红标、丁东、宋永毅、姚眉平、卢跃刚、高华、余汝信、陈益南、黎煜、姜东平、丁凯文、张跃宏、顾训中、冷卫、莫勒忒、陈墨、李宇峰、刘自立、冉云飞、贺立华、赵诚、傅国涌、散木、智效民、陈年希、王炎、张杰等数十位同道及友人的来信。情真可感，语多勉励。吾等唯戮力从事，以报万一。因来信甚夥，恕不一一回复，谨此一并致谢。

二、原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先生、原《求是》杂志高级编审阎长贵先生、原中

国工人出版社社长、总编、党组书记胡甫臣先生赐函本刊。嘱望之殷，托付之重，溢于言表。特摘录附下，以慰前辈，以励后学——

谢谢！《记忆》第一期已初读一遍，很好。在当局禁止纪念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出版纪念文革的民间刊物，记录下专制主义的残暴和人民的苦难，把那个谎言取代真理、兽性淹没人性的历史时期牢牢地印进人们的脑海里，从中获取教训，避免文革的悲剧重演，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它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一期有了一个好的开端，预祝它越办越好。

杜光

辛苦了！历史会铭记你们的辛劳。我收到就读，刚读一遍，感觉很好，开局不错，我想它肯定会受到研究文革人的欢迎，它也一定越办越好。

阎长贵

我举双手欢迎你们的这专门研究性的电子刊物出版，研究文革是一个伟大的工程。我要争取成为你们的热心读者。……你们的电子刊物将是文革学的启蒙者，文革研究成果的推荐者和仓库，全球文革研究情况的情报站，文革研究问题的探讨平台，文革史实的挖掘者和储藏库……这就是有了互联网的好处，要干就干。我要向你们提一个我心中早已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目前已有哪些说法？有哪些争论的焦点？希望在不影响你们的办刊计划的时候，介绍一下，讨论一下。我过去办报办刊物有一个经验，就是越有争论、讨论的问题时，越能吸引读者的关心，越能吸引读者参加办报办刊。

万事开头难，你们已开张了，就已经克服了困难的一半，祝你们越办越好，

祝你们成功！

一个退出历史舞台 84 岁的老者 胡甫臣

三、第一期启之文中提到“中宣部长胡启立”。丁东先生来信指出：胡启立没当过中宣部部长。他当时的职务是分管宣传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经查，丁东之说属实。特此纠正。谨向丁先生致谢，向读者致歉。

四、散木先生来信询问，王年一与吴迪往来信函中提到的《文革编年纪事》是否成稿。编者在此回禀散木先生：确如您所预料，此工程“并未实施”。